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張元 黃真重 教授

宋代蘇州吳學的经营及其發展趨勢



研究生：熊慧嵐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

國立清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推薦書

歷史 研究所 熊慧嵐 君所提之論文

宋代蘇州吳學的经营及其發展趨勢

(題目)

經由本人指導撰述，同意提付審查。

指導教授

張元
黃麗重

(簽章)

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9 日

國立清華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考試委員審定書

歷史 研究所 熊慧嵐 君所提之論文

宋代蘇州吳學的经营及其發展趨勢

(題目)

經本委員會審查，符合碩士資格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會

主持人

梁庚堯

(簽章)

委員

劉祥光

張元

黃寬重

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11 日

摘 要

本文以宋代蘇州的州級地方官學——吳學——為個案研究的中心，採用金石碑刻資料、地方志與宋人文集等材料，嘗試透過探討吳學校務經營的庶務層面，包括財務經理、吳學經營的職能分工，說明地方官學在地方社會中的發展及其趨勢，所衍生的社會責任與功能。

首先以宋代蘇州吳學為中心，梳理其由北宋至南宋大致的發展過程。其次，著重分析吳學的校務經營，先概略勾勒一般地方官學的財務情況，再透過碑刻等資料，再現宋代吳學的經營運作。此外，更藉由吳學校務運作的實際情況，探討在吳學中所呈現官學經營職責的分流，並說明教授的角色如何在吳學的校務經營中日漸凸顯。在此之上，更進一步闡述地方社會中各種不同的力量如何折衝，地方官學又如何從中衍生出教育之外的意義與社會功能。

透過本文的研究，希望能在過去對地方官學及蘇州區域研究的基礎上，以地方官學經營為主軸，討論宋代地方官學在地方社會發展中的一種可能性與趨勢，以「人」作為串連地方官學與地方社會的線索，作為對基層社會研究的嘗試。

宋代蘇州吳學的經營及其發展趨勢

目 次

摘 要	1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7
第三節 研究取徑、材料與章節安排	21
第二章 吳學的沿革	27
第一節 創設與萌芽——北宋時期的吳學	30
第二節 重建與發展——南宋時期的吳學	39
第三章 吳學的校務經營	47
第一節 吳學財務概況、經費運用與稅務問題	51
第二節 吳學校務經營中所顯現的職能分流	59
第三節 教授主導校務經營的角色逐漸凸顯	67
第四章 新社會功能的衍生	79
第一節 塑造太平氛圍的政治演出	81
第二節 以士人群體為中心的公益事業	86
第三節 官員理想與地方士人利益間的折衝	92

第五章	結 論	101
引用書目		107
一、	古典文獻	107
二、	近人著論・專書	110
三、	近人著論・論文	11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長期以來，宋代所以吸引中外學者投身研究，主要由於這個時代象徵了變化與轉捩，並且醞釀了中國此後數百年的基本性格。¹在這段變化期中，科舉制度尤其是影響宋代以降新社會性質形成的至要關鍵，而宋代官學教育的發展，正與之緊緊相依。

¹ 「唐宋變革」的提出，請參見內藤虎次郎，〈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入《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pp.10-18。關於唐宋之間的變遷，首由內藤虎次郎所提出，此後宮崎市定等日本京都學派學者大量投入研究後，成為極受史學界關注的議題。然而對唐宋變革的重要性與意涵，日本東京學派卻又迥然不同的意見，可參考仁井田陞的作品。此外，近年對於唐宋變革的內涵，也有學者嘗試重新整理，或提出檢討，詳見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81期（2006.01），頁125-171；與岸本美緒，〈發展還是波動？——中國「近世」社會的宏觀形象〉，《近世中國的社會與文化（960-1800）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二）》（台北：台灣師範大學，2005），頁1-16。

宋代官學教育的發展，源於對科舉取士的反省，秉著「教本於學校，士察於鄉里」的理想，試圖以學校教育改善科舉難察士人德行賢否之弊，然而從北宋到南宋，德行與學藝間的平衡，始終是宋廷取士擢才的一道無解課題。在此之上，地方官學被視為地方人才向中央輻輳的端源，在宋代，特別是北宋，經歷多次改革，雖然在教育與取士方面，地方官學最終仍相當程度淪為科舉附庸，但在科舉制度運作下，由於社會對教育的需求日益殷切，在各地書院或各型態私學蓬勃的同時，地方官學仍舊持續發展。官學與科舉制度的結合，如解額制度、在學聽讀限制等，使地方官學成為在地士人透過科舉入仕的重要途徑，復以寄籍官學可帶來的待遇優假，諸多士子更因此趨之若鶩。

就教育史研究而論，地方官學的意義，或許因其性質凝固在以科舉目標的功利取向上，以致學者對宋代地方官學研究的關注，被書院研究所取代，但這卻不代表地方官學不再有研究價值。相反地，由於北宋以降地方官學普遍設立、學田制度形成、教官選任與路級教育監察機構確立，地方官學的官方性質與諸制度，非但確保了官學以教育機構在地方社會的存續，也使地方官學成為地方社會活動的重要場域。透過祭孔、鄉飲酒禮等儀典的舉行，或是作為宣告政令之所，即使地方官學原有的知識傳授功能，逐漸分散到各形態的私學機構，但地方官學在宋代卻仍持續被賦予著其他諸多社會功能。此外，地方官學與科舉考試間的密切關係，更使之成為地方士人往來輻輳之處，而士人又是官員治理地方不能不仰賴的要角；因之，地方官學無論作為地方社會的機構或活動場域，都與地方事務的運作不可分離。也就是說，如果能轉換過去從制度或教育層面

觀察的途徑，嘗試由地域社會或人際活動著手，宋代地方官學的研究，便能再次開展新的局面。

近年來，由於宋史研究對基層社會議題的重視，²研究者開始從新的角度，觀察宋代地方官學，因而得以補充過去對宋代地方官學的認識。有別於過去從制度發展的角度切入，所得「宋代地方官學發展由北宋到南宋漸趨消極，乃至淪為科舉附庸」的結論，透過宋代基層社會研究，可以發現地方官學作為基層社會的組成元素之一，非但是地方士人往來活動的主要場域，也往往具有凝聚士人意識的作用，對宋代基層社會運作有著積極的影響。³

² 吳雅婷曾對 1980 到 2000 年間的宋代基層社會研究有很詳盡的回顧與評介，可參見氏著，〈回顧一九八〇年以來宋代的基層社會研究——中文論著的討論——〉，《中國史學》第 12 卷（2002.10），頁 65-93。

³ 相關文章可參見方誠峰，〈統會之地——縣學與宋末元初嘉定地方社會的秩序〉，《新史學》第 16 卷第 3 期（2005.09），頁 1-22；黃寬重，〈兩宋政策與士風的變化〉，發表於「基調與變奏：7-20 世紀的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三屆中國史學會專題演講，以及〈宋代基層社會的權力結構與運作——以縣為主的考察〉，即將發表於《中國史新論·基層社會》乙書；鄭丞良「南宋明州州學先賢祠與人物祭祀」（未刊稿）、以及「作新士息之機」：試論宋元之際四明士人風氣與九先生祠的設置」（未刊稿）；山口智哉，〈宋代鄉賢祠考〉，《大阪市立大學東洋史論叢》15 號（2006.11），頁 89-111，以及山口智哉，〈宋代鄉飲酒禮考——儀禮空間としてみた人的結合の〈場〉〉，《史學研究》241 期；伊原弘，〈中国知識人基層社會——宋代温州永嘉學派を例として——〉，《思想》802 期

過去宋代地方官學教育與制度的研究，以及近年學界對宋代基層社會的討論，都累積了相當豐碩的成果，本文踏著前人的腳步，嘗試藉助這些成果，對宋代地方官學發展與地方社會的關係，提出更進一步的詮釋，藉以說明宋代地方官學在地方社會發展中的一種可能性與趨勢。

這種可能性與趨勢，首先表現在地方官學教授角色的凸顯。從熙寧年間，州學教授開始必須經由考試始能選任後，地方官學教授一職便日益專職化，並且其職任不僅限於從事教學工作，也必須承擔起主持學校各種事務的責任。由於地方官學事務日漸繁雜，知州等地方官員本身事務負擔也日漸繁重，因而促使地方教育與其機構的經營權責，隨著地方官學教授此一職任的確立與專職化，逐漸匯聚到原本主要以教務為重的教授之上。知州等地方長官其職責雖然仍總括轄區內所有的地方事務，但對地方官學的經營已不再完全事必躬親，在一般情況下，僅負擔著推動教化的監督責任，而地方官學教授則轉為學校事務的全方位經理人。

其次，即使地方官學原本作為教育機構及入仕途徑的效益漸趨消極，但隨著科舉文化的發展，地方官學逐漸深植於所在社會，也因此在其他方面衍生出了新的意義。由於入仕途徑緊縮，士人人數日益增加，加上士人對「士」身份認同的提昇，由北宋到南宋，士人逐漸成為地方社會中別具意義的群體，主導著地方社會發展的方向與力量。⁴隨著地方士人與地方官學間的交會點，由中央轉向了地方

(1991)。

⁴ 黃寬重，〈兩宋政策與士風的變化〉。

社會，地方官學與地方士人間的關係便開始出現了變化；地方官學非但成為地方士人匯聚之地、地方社會文化活動的中心，更產生了照顧地方士人群體的責任。地方官學的社會功能，因應著士人群體的產生而演變出來，在此過程中，主學者與地方長官的意向扮演著主導角色，而地方士人更是促成此趨勢產生的重要因素。

當科舉文化成為宋代社會的基調之一，地方官學隨科舉文化在基層社會中生根的同時，地方官學為因應基層社會的需要，逐漸從原本以教育選才為主要目的的機構，衍生成具有照顧地方士人群體之社會責任。這些新生的社會責任與功能，使深植於地方社會的官學機構，相當程度類似現代的法人組織；其功能的發揮，首先以地方士人群體為主要對象，行有餘力，則向外擴及地方社會的其他成員。在此過程中，地方社會上各方帶有不同立場的人，將各自不同的考量包裝其中，推廣理念、履踐志業、追求名望、乃至謀求現實利益，不一而足。

為了具體說明上述的可能性與趨勢，本文選擇以宋代蘇州的吳學作為討論中心，嘗試以個案研究的方式，來詮釋宋代地方官學的可能性與趨勢。⁵所以選擇以吳學為討論對象，乃因唐代以降，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到宋代，江南已成為當時的經濟中心，其中又以東南大郡蘇州尤為富庶，諸如「蘇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蘇杭」等南宋時諺，皆描述了當地生產力之茂盛、城市發展之繁榮。經濟繁榮帶動文化發展，自五代十國以來，蘇州相對

⁵ 吳學的正式名稱，在北宋為蘇州州學，在南宋為平江府府學，由於蘇州地區舊屬吳郡，吳學便成為當時人對這所地方官學的通稱。

安定而少戰亂，優越的環境成爲士大夫及其家族與達官貴人僑寓置產，乃至落地生根的選擇，也形成了此地特殊的地方社會形態。在鄧小南對蘇州士人家族的研究中便曾提出，蘇州因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所累積的文化基礎，徙入者較高的文化水平較高，促進了區域文化的有機融合，與當地「菁英文化」發展的良性循環，特別是由部分士人家族所帶動起，以科舉及第者爲代表的「菁英人物」的成長與湧現。⁶南宋時，更名爲平江府的蘇州更在被譽爲「士大夫淵藪」的七州府中，位居首位。⁷

蘇州被譽爲文化繁夥之地，相對保留了較多史料，這是歷史研究的首要關鍵，也是本文選擇蘇州地區作爲研究對象的另一個原因之一。過去學者利用宋代蘇州地區豐富的史料進行研究，議題主要集中在當地蓬勃的社會經濟與城市發展、緊密的士人交遊網絡與頻繁的文化活動等方面，成果豐碩；然而地方官學作爲在地社會重要的場域與機構，其與地方社會間的互動關係，卻仍有討論的空間的研究主題。本文正是基於蘇州地區的重要性與代表性，以及足以支持研究進行的材料，而選定以蘇州地區爲對象，展開對宋代地方官學發展與地方社會關係的討論，希望透過「人」在其中的活動，將「官學」與「地方社會」兩個主題結合在一起，以作爲對基層社會研究的嘗試。

⁶ 鄧小南，〈北宋蘇州的士人家族交遊圖——以朱長文之交遊為核心的考察〉，《國學研究》3（袁行霈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02），頁451-488。

⁷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20（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26b。

第二節 研究回顧

一、地方官學方面

關於宋代教育研究，二十世紀初，日本學者狩野良知以《宋元學案》為基礎，加入宋代思想內容，討論宋代教育理論，以史學知識與方法，開啓了討論先聲。⁸此後，陳東原以「養士教育」與「實際教育」等論點，重新詮釋了宋代教育的歷史發展，連帶改變了研究者對材料蒐集與處理的方法。⁹在此階段，對宋代地方官學的研究，仍附屬於對宋代教育的概括討論中。1950年代之後，由於對《續資治通鑑長編》與《宋會要輯稿》的大量利用，宋代教育研究有更進一步的發展，¹⁰其中涉及地方官學的討論，可分為三種類型。

首先是在討論整個宋代教育發展的脈絡中，兼論地方官學。¹¹這類研究多以兩宋教育政策為軸，從崇文抑武的

⁸ 狩野良知，《支那教學史略》，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03。

⁹ 陳東原，《中國教育史》，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此外，陳青之以馬克思歷史分期討論中國教育發展亦是一途，見陳青之，《中國教育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¹⁰ 李弘祺，〈宋代教育史研究的幾個方向〉，收錄於《宋代教育散論》（臺北：東昇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頁3-5。

¹¹ 這類作品如趙鐵寒，〈宋代的學校教育〉，《學術季刊》第3卷第2期（1954.12），頁36-47；寺田剛，《宋代教育史概說》，東京：博

立國背景，到北宋三次官學教育改革，以及南宋受到理學發展影響後的宋代教育，進而論及宋代學校教育的管理機制、經費來源、教材，以中央官學為主，將地方官學討論附於其下，偏重制度層面。其中，李弘祺在 1977 年所發表的“Life in the Schools of Sung China”，是眾多討論宋代教育研究中的異數。¹²該文在教育制度之外，選擇以學校師生生活為討論中心，探究在科舉社會下，士人除了應付科舉，如何建立其社會網絡，以及在科舉對士人進入官僚系統的限制下，廣大士人社群如何尋找價值上的出路。

諸多討論整體宋代教育的研究成果中，以袁征《宋代教育》最值得參考。¹³該書就宋代官學與書院的主要教材與課程、學生的考試和升級、教職員的選任三方面入手，著重政府教育政策、法令、管理制度等，對宋代教育系統的組織運作，說明詳盡。該書對宋代教育研究的貢獻，不僅在翔實細膩的制度整理，更在對宋代教育意義的詮釋。

文社，1965；程運，〈兩宋學校制度之分析〉，《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24 期（1971.12），頁 85-109；Lee, Thomas H. C., *Education in Northern Sung China*, Ph. D. thesis, Yale University, 1974；Lee, Thomas H. C., “Life in the Schools of Sung China”,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y*, 37(1977), pp. 45-60；袁征，《宋代教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苗春德，《宋代教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張春生，《兩宋官學教育政策研究》，河北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¹² Lee, Thomas H. C., “Life in the Schools of Sung China”, in *Journal of Asian Study*, 37(1977), pp. 45-60.

¹³ 袁征，《宋代教育》。

袁征在該書中提出，宋代教育作為「中國古代教育的歷史性轉折」，其轉變起於適應社會情勢的需要，並指出宋代教育轉折的關鍵時期，進而分別描述官、私學情況，以呈現各時期發展特質，充分宋代教育的發展與歷史脈絡結合。然而，《宋代教育》美中不足之處一如同類討論整體宋代教育的研究，對教育在地方社會中的角色、其文化或社會意義等面向較少論及，對地方官學的討論亦附於中央官學之下，但作為本研究主題對宋代教育的背景認識，仍助益匪淺。

其次，是將宋代官學教育置於科舉制度運作下，討論兩者之間的關係，諸如宋代官學教育的改革如何針對科舉取士的弊端而起，在各地官學實行的解額制度對科舉乃至宋代社會的意義等等。¹⁴在這類討論中，以李弘祺所著《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最具重要性。作者在該書中提出，即使北宋以教育代替科舉的改革失敗後，官學淪為科舉的附庸，但地方官學並未衰落，反因與科舉建立各項制度鍵結，

¹⁴ 如陳東原，〈宋代的科舉與教育〉，《學風》第2卷第9期（1932），頁5-39。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英文版出版於1985年。Lee, Thomas H. C., “Sung Schools and Education before Chu Hsi”, in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John W. Chaffee ed.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05-136. Lee, Thomas H. C.,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Quota System in Sung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13(1982), pp. 287-318.

仍然繼續繁榮；同時也指出，北宋以降地方官學普遍設立、學田制形成、教官選任與路級教育監察機構確立，是宋代地方官學最重要的特色。該書詳細介紹地方官學的組織、教育內容、教職人員、學生與財政，並指出地方官學生活與所在地的社會活動關係，雖然其討論對學校與地方社會的互動，未有充足的闡述，但對本研究主題發展頗具啓發性。

最後，則是專以地方官學為中心的討論，又可分作四類。

一類試圖勾勒宋代地方官學的整體面貌，主要著力在地方官學興廢、學官制度、學生來源與出路、教育經費與課業內容等方面。¹⁵無論論者著重政策推動者或政策本身，大多都將宋代地方官學分作慶曆、熙寧、崇寧及紹興興學四階段，認為地方官學沒落衰敗是南宋紹興之後的發展趨勢。討論地方官學運作時，多偏重制度，較少討論實際運作。

這類研究中，以趙鐵寒〈宋代的州學〉為先聲，1950

¹⁵ 如趙鐵寒，〈宋代的州學〉，《大陸雜誌》7卷10期、11期（1953），頁15-19、15-17。林子勛，〈宋代地方教育的發展〉，《華岡學報》第2期（1965.12），頁155-176。劉子健，〈略論宋代地方官學與私學的消長〉，《宋史研究集》第4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69，原於1965年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頁189-207。黃書光，〈宋代地方官學考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4，1986，頁53-57。郭寶林，〈北宋的州縣學〉，《歷史研究》1988年第2期（1988.04），頁80-91。周愚文，〈宋代的州縣學〉，臺北：國立編譯館，1996。

年代之後宋代學校教育討論也是由趙鐵寒開啓風氣之先，但此後以宋代地方官學爲主題的研究，卻也出現了斷層。1996 年，周愚文所著《宋代的州縣學》，再度開啓對此主題的討論。該書從「宋代州縣學的設置、經費與師資」、「宋代地方官學行政體制」、「州縣學的學生與學習」三個層面，探討宋代州縣學的發展與對後世的影響，嘗試利用部分社會學概念與統計學方法，就各路一一分析州縣學的設置，並檢討其教育成效，更嘗試說明政治、經濟、人口、社會思想等因素，對宋代州縣學的影響。此外，該書設計了許多統計、分析或州縣學校分佈狀況等圖、表，作爲補充。基本上，關於地方學校的方方面面，該書多已涉及，然而包羅萬象未必等同精闢入理，作者嘗試闡述宋代州縣學對當代乃至後代社會的意義，但討論內容卻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或歷史發展略嫌疏離；對地方官學的量化分析，也未能提出有意義的見解與說明，殊爲可惜。¹⁶

其次，是針對宋代地方學校學規、學職人事與行政體系等管理方面的研究。¹⁷在學規方面，目前〈京兆府小學

¹⁶ 在這方面，劉子健對宋代地方官學與私學間消長的討論所提及的時代意義值得參考，陳雯怡對南宋書院復興過程中理念與制度間互動的討論，也可作爲認識宋代地方官學的對照思考點。劉子健，〈略論宋代地方官學與私學的消長〉，《宋史研究集》第 4 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69，原於 1965 年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頁 189-207。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¹⁷ 如劉真，〈宋代的學規與鄉約〉，《宋史研究集》第 1 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58），頁 367-391。李弘祺，〈宋代地方學校職事考〉，

規〉是學者最常用以理解宋代官學教育行為規範的材料，但由於現存宋代官學學規的資料不多，學者對學規的討論也常以著名教育學者如胡瑗、朱熹、陸九淵、呂祖謙等人所提出的教育規範為參考。在官學的學職人事方面，李弘祺〈宋代地方學校職事考〉則以學記、金石碑刻、《宋會要輯稿》等材料，盡可能列舉並說明地方學校學職的設置。

另一個宋代地方官學的討論重點是「提舉學事司」。由於宋史記載之誤，過去一度被認為北宋末即廢止。實際上，提舉學事司在南宋復置之後，該單位持續存在到宋代結束，甚至北宋之後的金、南宋滅亡之後的元都延續其設置。在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及袁征《宋代教育》中，也都對「提舉學事司」特別提出說明，並將之與學田制同視為宋代官學教育，特別是地方官學的重要特色，對學校的財務經營上關係尤為密切。雖然對南宋之後復置的「提舉學事司」性質與重要性是否仍與北宋相同，學者有不同的意見，但在觀察宋代地方官學與地方社會間的互動，或其在地方政治環節中的位置，都是值得注意的要點。¹⁸

《史學評論》第8期（1984.07），頁223-241。葛紹歐，〈宋代的提舉學事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8期（1990.06），頁1-11。顧宏義、王守琴，〈兩宋州縣學官及其任用考核制度〉，《洛陽師範學報》2001年第4期，頁69-72、80。櫻井智美，〈儒學提舉司の起源と變遷——兼論宋金の學校管理〉，《阪南論集（人文自然科學編）》37:4（2002），頁41-52。

¹⁸ 櫻井智美即認為，由於南宋復置的提舉學事，是由其他其他州級或路級官員兼任，而非專置，所以是回到宣和三年(1121)創置提舉學事司之前的作法，形同讓地方教育的興廢，取決於地方長官的

再者，是以學校經濟為主題的研究。¹⁹對地方學校財政的討論，主要焦點集中在學田制度，進而擴及其他學產及經費來源，濫觴於福澤與九郎〈宋元時代州縣學產考〉，以碑刻等材料中田籍與其他產業的紀錄，詳細考究地方官學經濟情況。²⁰漆俠〈宋代學田制中租佃關係的發展〉一文，要旨並非關注地方官學財政，但文中指出的「二地主」現象、土地零碎及貨幣地租等問題，有助於將學校經營的討論從學校內部向地方社會推展開來，作為討論學校經營與地方社會其他成員間關係的線索。²¹

袁征“Local Government Schools in Sung China: A Reassessment”和韓鳳山〈北宋多渠道籌措官學經費述論〉兩篇文章，都以宋代地方官學經費來源的多樣性為主題，

對教育的熱心程度與意向上。櫻井智美，〈儒學提舉司の起源と變遷——兼論宋金の學校管理〉，頁 42。

¹⁹ 如福澤與九郎，〈宋元時代州縣學產考〉，《福岡學藝大學紀要》第 8 期、第 9 期（1958、1959），頁 27-42、27-36。漆俠，〈宋代學田制中租佃關係的發展〉，《求實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頁 160-175。Yuan Zheng, Local Government Schools in Sung China: A Reassessment,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34, No. 2.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Summer, 1994), pp.193-213. 韓鳳山，〈北宋多渠道籌措官學經費述論〉，《社會科學戰線》2002 年第 2 期（2002.02），頁 146-148。

²⁰ 福澤與九郎，〈宋元時代州縣學產考〉，《福岡學藝大學紀要》第 8 期、第 9 期（1958、1959），頁 27-42、27-36。

²¹ 漆俠，〈宋代學田制中租佃關係的發展〉，《求實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頁 160-175。

但袁征的文章在同樣列舉地方官學經費的多樣籌措管道之外，更以此重估過去「宋代君主重視教育」的說法，值得參考。該文指出，因未專設教育經費預算，宋代地方官學資金始終短缺，即便有學田，地方官學經費相當程度仍賴私人捐助，或被地方政府將負擔轉嫁給當地人士。由於地方官學財政、建設，與多數用以籌措官學經費的措施，始終受控於國家或地方政府，學校財政不僅不獨立，更時常被官方當局移作他用或被其他力量侵佔，所有教育活動都成為官方的恩賜。地方官學層級越高，或越接近一地政治中心，才能享有越好的待遇。此外，也再次論及提舉學事司對宋代地方官學財政經營上的重要性。這些論點，都有助思考地方官學跟當地政治機構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和互動。

最後，是以區域教育為主的討論，即使取徑未必相同，但與本研究主題所希望發展的方向最為接近。²²1980年代，葛紹歐所發表三篇討論四川、湖州、徽州等特定地區文教情況的文章，是這類方向的初步嘗試，其中討論四川者集中在州縣學部分，湖州與徽州則擴及私學及其他文教

²² 如葛紹歐，〈宋代四川地區的州縣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2期（1984.06），頁23-83。葛紹歐，〈宋代湖州的文教〉，《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5期（1987.06），頁95-118。葛紹歐，〈宋代徽州的文教〉，《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88），頁535-550。陳國燦、高飛，〈宋代兩浙地區州縣學發展論述〉，《台州師專學報》第21卷第1期（1999.02），頁17-21。顧宏義，《教育政策與宋代兩浙教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活動。三篇文章都試圖將地方教育與該地自然、社會環境連結，兼論國家情勢、文化風氣，以及地方人士或長吏對該地教育的推動或貢獻。雖然這種以區域討論地方文教的研究取向，在討論學校教育與地方社會的關係上，值得參考，但是三篇文章都僅條列當地各項可能有助文教的條件，未說明各條件間如何運作互動，使全文顯得支離。

1999年，陳國燦、高飛所發表的〈宋代兩浙地區州縣官學發展論述〉，就州縣官學發展概況、教學內容、管理制度演變、發展特點與原因等方面，討論兩浙地區的州縣學。該文仍舊以宋代國家教育政策為主線，分別提出官學發展各階段涉及兩浙地區的材料，將宋代官學發展視同兩浙地區官學的發展，即使提出經濟繁榮、文教傳統與數位知名學者等「特色」，亦未分析上述條件與兩浙州縣學的關係。

顧宏義《教育政策與宋代兩浙教育》在涉及區域教育的研究中，較為突出，要在其選題與所用材料、方法較能相切合。該書討論中央政策與地方教育發展間的互動，從宋代教育政策的演變與兩浙地區教育發展之關係上分析，認為宋廷以「崇文抑武」國策為宗旨的教育政策，基本符合廣大士人利益，但兩者並非始終重合，當矛盾出現時，教育政策便在執行中被敷衍，甚至遭到集體抵制，迫使宋廷最終改變作法。由於中央教育政策與地方教育發展相互制約、影響、適應，而非由上到下單向施加，因此作者認為宋代教育政策所以成功，正是因其大體能根據社會實際情況更動調整以符合社會需要，從而有效控制教育發展。

透過上述回顧，可以大致掌握宋代地方官學研究發展至今的概況：目前對宋代地方官學教育的體系、制度、學校財政、教學內容與教材、教師選任、學生來源與出路等

問題，也就是制度層面的研究已大致完備，但對地方官學運作與地方社會關係的注意，仍略嫌不足。顧宏義以「政策與回應」為區域教育的討論中心的取向值得參考，著眼卻較傾向中央教育政策與地方官學發展間的互動，忽略其研究原欲探討的地域社會部分；其他學者對將地方官學與所在地連結的嘗試，則由於未以妥善的分析說明將地方官學與所在地方社會二者串連，反而生硬支離，值得借鑑。

二、蘇州區域研究方面

歷來對宋代蘇州的研究繁多，大多傾向對該地社會經濟發展的研究，其中以梁庚堯〈宋元時代的蘇州〉最全面且具重要性。²³該文以宋、元時代為限，廣泛利用方志、

²³ 對宋代蘇州地區社會經濟方面的研究，可參考梁庚堯，〈宋元時代蘇州農業的發展〉，《宋史研究集》17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86），頁491-523；梁庚堯，〈宋元時代的蘇州〉，《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1997），頁334-480；梁庚堯，〈宋代太湖平原農業生產問題的再檢討〉，《台大文史哲學報》第54期（2005.05），頁261-304。其次，土地利用、水利與稻作等問題，也相當受到日本學者關切，如周藤吉之，〈宋代浙西地方の圍田の發展〉，《宋代史研究》（東京：東洋文庫，1969），頁305-436。周藤吉之，〈宋代浙西地方の圍田の發展補論〉，《東洋大學紀要》4（1968），頁43-56。地濃勝利，〈宋代の蘇州水利田地域に於ける水利勞役に就いて——佃戶の勞役負擔の解明に向けて〉，《社會經濟史學》43-4（1977），頁23-44。足立啟二，〈宋代兩浙における水稻作の生産力水準〉，《文學部論叢・史學篇》17（熊本大學，1985），頁80-100。寺地遵，〈南宋期、浙東盜湖問題〉，《史學研究》183（廣島大學，

文集對蘇州地區的記載為材料，就「地理形勢與經濟關係」、「社會結構與商業活動」、「市鎮興起與城市發展」三層面，細緻而縝密地說明了蘇州由於地形、位置、人口、自然資源，加上政府與當地社會成員對該地建設的投入，農產、手工業發達，從而帶動了當地產品外銷；商業繁盛，促進了蘇州的城市發展，使其在全國經濟體系中具有關鍵地位。同時，亦就商品在市場中的供給需求，闡述蘇州與外地的往來貿易關係，及在全國商業中的地位。雖然該文旨在說明蘇州的社會經濟發展，對基層社會的討論，僅就身份將人劃分為不同類型，說明其在社會結構鍊中，特別是消費行為上所扮演的角色，但〈宋元時代的蘇州〉對蘇州發展的詳細考究，仍為以蘇州為考察中心的區域研究，

1989)，頁 17-31。此外，都市發展及士人在其間的活動也是學者關注的主題，可參考伊原弘，〈唐宋時代浙西における都市の變遷——宋平江圖解讀作業〉，《中央大學紀要・史學科》24（1979），頁。伊原弘，〈宋代の浙西における都市士大夫〉，《東洋學》第 45 號（仙台：中國文史哲研究會，1982），頁 44-62。伊原弘，〈宋代浙西における都市と士大夫〉，《中嶋敏先生古稀記念論集》上卷（東京：汲古書院，1980），頁 327-350。礪波護，〈唐宋時代における蘇州〉，收入梅原郁編《中國近世の都市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4），頁 289-320。伊原弘，〈江南における都市形態の變遷——宋平江圖解讀作業〉，《宋代の社會と文化》（東京：汲古書院，1983），頁 103-138。伊原弘，《蘇州——水生都市の過去と現在》，東京：講談社，1993。塩卓悟，〈南宋代における蘇州の經濟的性格と商品流通構造〉，《千里山文學論集》59（關西大學大學院，1998.03），頁 87-112。

提供了紮實的立足點。

以人際交遊為核心的討論上，則有鄧小南的〈龔明之與宋代蘇州的龔氏家族：兼談南宋崑山士人家族的交遊與沈浮〉、〈北宋蘇州的士人家族交遊圈——以朱長文之交遊為核心的考察〉等文章。²⁴這些文章以中等層次的地方性家族為考察一區域內士人家族的內外關係為中心，反映以鄉里為活動基礎與經濟依托的士人家族，在蘇州地區的交遊與沈浮。透過當地士人及其家族與地方官員、當地其他士人家族與個別士大夫的人際往來，闡述無形的社會關係，如何滲透影響社會諸事物的運行過程，而不同形態的關係網絡又如何決定的一地社會面貌。由於關注點不同，在「家族與社會」的議題中，雖已呈現較生動的地方社會人物活

²⁴ 請參考鄧小南，〈北宋蘇州的士人家族交遊圈——以朱長文之交遊為核心的考察〉，《國學研究》3，451-488頁；鄧小南，〈朱長文家世、事歷考〉，《北大史學》4（北京大學歷史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08），頁72-87；鄧小南，〈龔明之與宋代蘇州的龔氏家族：兼談南宋崑山士人家族的交遊與沈浮〉，《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81-109。此外，以人為中心的討論，范仲淹對蘇州地區的影響亦是研究的關注點之一，相關研究可參考遠藤隆俊，〈宋代蘇州の范氏義莊について〉，《宋代知識人——思想・制度・地域社會》（東京：汲古書院，1993），頁195-228。遠藤隆俊，〈宋代蘇州の范文正公祠について〉，《柳田節子先生古稀記念中國傳統社會と家族》（東京：汲古書院，1993），頁329-346。陳學霖，〈范仲淹與蘇州地區之發展〉，《范仲淹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90），頁1083-1150。

動，但較集中在個人或個別家族的人際往來、事歷發展，而非地方事務運作，不過仍舊在「人」的切入點上，提供了未來研究上相當豐富的線索。

關於地方事務運作，方誠峰的〈統會之地——縣學與宋末元初嘉定地方社會的秩序〉²⁵著重場域象徵意義的遷轉——縣學由官民合作場域，到人際、理念、制度的「統會之地」，轉而為文化孤島——與各類人物在其中角色的相對轉換，所折射出的地方社會運作秩序。該文以基層社會事務為主題，將對抽象秩序的討論具體落實在對縣學的討論上，研究取徑與本計畫相近，是未來研究可取法的對象。高柯立在其博士論文《官民之間：南宋地方官府與民眾的溝通》中所討論的官民互動，值得參考。²⁶該文由地方官與民眾的日常交往入手，考察地方官與地方士人的宴集唱和、修纂方志，以及地方官與各階層民眾在地方公益事務與祭祀活動的往來，試圖探討在榜論、訴訟等制度性渠道之外，地方官尚可藉由哪些途徑，與民眾建立聯繫。雖然該文強調的是「溝通」的進行，但不失為一種啟發，有助於觀察不同社會角色，如何在地方事務運作起著不同作用。

目前對宋代蘇州地區的研究，多著眼於該區域的社會經濟層面，如土地利用與稻作問題等等，或是商業活動與社會結構、都市發展間的關係。在討論地方人士交遊的議

²⁵ 方誠峰，〈統會之地——縣學與宋末元初嘉定地方社會的秩序〉，《新史學》第16卷第3期（2005.09），頁1-22。

²⁶ 高柯立，〈地方官與地方社會——以平江府為例〉，《官民之間：南宋地方官府與民眾的溝通》第4章，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題上，雖已呈現較生動的地方社會人物活動，但由於關注點不同，而較集中在個人或個別家族的人際往來、事歷發展，而非地方事務運作，這點正是本研究能夠借重過去所累積的成果，透過對蘇州地方官學發展的討論，對蘇州地域社會研究有所補充之處。



第三節 研究取徑、材料與章節安排

研究宋代地方官學發展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必須落實在對具體事件的討論上。過去的研究，雖然同樣是建築在具體事例上，不過由於研究的目標，往往希望藉由各時段各地區零碎的資料，拼湊出宋代地方官學發展的整體圖像，難免會使得論述中所使用的材料，被從材料本身所處的時空背景中抽離。

本文選擇以宋代蘇州的吳學為考察中心，首先著重在吳學的背景條件。吳學地處蘇州，在宋代是江南的經濟重心，當地生產力茂盛、城市發展繁榮。經濟繁榮自然帶動文化發展，自五代十國以來，蘇州相對安定而少戰亂，優越的環境成為士大夫及其家族與達官貴人僑寓置產，乃至落地生根的選擇，也形成了此地特殊的地方社會形態，南宋偏安，以臨安為行在，當地更被視為肱股之郡。蘇州因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所累積的文化基礎，加上徙入者較高的文化水平，使蘇州地區有「士大夫淵藪」之譽，而范仲淹在景祐二年(1035)所創設的吳學，正是蘇州地區最重要的文教中心。

就宋代的地方官學而言，官學與科舉制度的搭配、學田制度及學官制度的確立，是地方官學維繫的基本元素。然而，具備這些基本元素，未必代表一所地方官學能永續經營。吳學的特殊之處在於蘇州所具備的政治、經濟條件，提供了吳學更多的社會、經濟資源以利其順利經營營運。從現代研究者的觀察看來，相較於其他地區的地方官學，

吳學似乎從北宋創建以來，始終延續不墜，即使在兩宋之交曾有短暫的中斷，但也是在全城都因戰火而癱瘓的情況下，而且相當迅速就開始恢復運作。乍觀之下，宋朝所推行的地方官學政策及相關的學田、學官等配套，加上蘇州地區特有的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條件，成就了吳學延續不墜，但事實上，更重要的是人的作為如何在吳學的經營中發揮效能。

本文主要的目標，即在透過探討吳學的校務經營，試圖說明地方官學在地方社會中的發展情況，及有著什麼樣的可能性。校務經營的範圍廣泛，包括教學、行政、師生互動生員及財務管理等等眾多面向。誠如前述，過去以教育史為取徑的研究，已經對地方官學的制度、教學內容等問題，有詳細的論述，此外，也受限於目前所能獲得得材料，在本篇論文中，不計劃就官學制度、教學內容等層面討論吳學的經營，而將著重在庶務性的部分，包括財務經理、吳學經營的職能分工，以及其在發展過程中所衍生的社會責任與功能。

本文所希望做到的是，能將史料與原有的時空環境重新結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觀察「人」在其中的活動情形。這樣的作法，當然會使這個以個案討論為中心的研究，有無法廣泛解釋宋代其他地區地方官學發展運作情形的疑慮，實際上也正是如此。然而，本文的目標，卻也僅止於說明當歷史發展的諸多條件，匯聚到宋代蘇州此一時地時，地方官學與地方社會之間，會激盪出什麼樣的可能性，人在其中實際的活動情況又是如何。這些內容與發展趨勢，不見得能照版摹刻到其他地區，但在類似的條件背景下，蘇州地區的例子絕對不會和其他地區背道而馳、獨立

存在，而在這樣的認識下，便能凸顯出這個個案研究的價值。

現有的研究已經掌握了宋代地方官學發展大致的起承轉合，這是本文研究相當重要的線索，沿著這條線索，可以避免對吳學的發展過度詮釋。但是也正如研究回顧中所提到的，光是把一地所發生的事件，逐一對應到整個宋代的教育政策上，是不夠的，還必須把「人」和「環境」一併納入考慮，畢竟討論的不是教育史，而是地方官學作為地方社會上的一個機構與活動場域，如何透過人與所在地方社會產生關連與互動。

因此，當面對吳學的諸多材料，首先必須把當時宋代地方官學的發展情況當作背景，同時思考其中所反映的事件，交織著什麼樣不同性質的問題，可能是經濟環境、法律訴訟、政治情勢發展。其次，要思考事件的參與者。哪些人涉入所討論的事件之中？地方官、地方士人、官學教授或學生，甚至是當時並不在蘇州的人；他們為什麼涉入事件之中？在事件之中所做的選擇或造成的結果又是什麼？這些結果是隨著事過境遷，或者在地方社會上留下了什麼影響？最重要的是，這些事件都是環繞著地方官學，而不是其他機構或場所所發生的，又是為什麼？當這些問題逐一得到了妥適的瞭解，便能試著描繪出宋代地方官學發展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存在著什麼樣的可能性與發展趨勢。

本文以吳學為個案研究的中心，主要採用的材料包括金石碑刻資料、地方志與文集。

碑刻資料直接保留了一時一地事務經營的片段，就吳學而言而言，碑刻資料除保留地方官學建置、沿革之外，

也有助瞭解部分經營的實際內容，特別是許多與學產相關的記載，包括田籍資料、學糧收入、校產盈餘的利用；在南宋之後，部分關於學校與地方民眾的土地爭訟、由各級官員乃至中央所發下的公牒判文，亦在碑刻資料之列。不過，其缺點亦來自碑刻資料僅能反映事物的片段，缺乏連續性，很難說明是否提供結構性條件或意義，必須結合其他資料才能更更有效發揮。目前，除了碑刻拓片，如《江蘇通志稿》所收錄〈金石志〉等碑刻輯錄，已經對宋代蘇州地區相關的金石資料，做了相當完整的蒐集，資料相對集中；然而這些刊刻本也時有轉錄時缺漏或錄文者誤讀的情形，必要時須與拓本參酌比對。此外，比對收錄在文集中的記文，也對提升史料的運用有所助益。

就地方志而言，蘇州地區方志繁多，以北宋朱長文所著《吳郡圖經續記》，與南宋范成大所著《吳郡志》為首要，直接保留了當代的紀錄；復以《吳郡志》在南宋中後期經過增補，所能提供的資料時限範圍亦有增益。其次，有明代所修《姑蘇志》、清同治年間所修的《蘇州府志》，此外蘇州轄下各縣也各有其方志。不過，方志的問題，除了有時在記載上或許失之簡略，更致命地是可能因為後代人在追述前代史事時，照抄或誤解前志而錯謬，在可靠性上稍弱，因此利用時需要盡可能比對查證其他材料。

在文集方面，以宋人鄭虎臣所編《吳都文粹》，與明人錢穀所編《吳都文粹續集》，最為重要。兩書均收錄與蘇州地區有關之詩文、碑記，乃至蘇州人士墓誌，對宋代蘇州的瞭解，與當地地方事務的運作、人際活動情況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材料。除了這兩種以地方蒐集地方詩文資料為主的文集之外，宋人別集中對蘇州地區的記載也間或能

作為研究的補充。此外，除了文集，宋、元筆記也是必須參考的資料，特別如朱長文《中吳紀聞》、陸友仁《吳中舊事》，便保留了相當多當時人活動的記載或軼聞，能夠為本研究提供更豐富的討論線索。

在諸多與吳學發展有關的材料上，本文第二章首先將以宋代蘇州吳學為中心，梳理其由北宋至南宋大致的發展過程。第三章，則著重在吳學的校務經營，首先先概略說明一般地方官學的財務情況，再透過碑刻等資料，說明吳學的情形。其次，藉由吳學校務運作的實際情況，討論在吳學中所呈現官學經營職責的分流，並討論教授的角色如何在吳學的校務經營中日漸凸顯。在此之上，第四章，則闡述地方社會中各種不同的力量如何折衝，地方官學又如何從中衍生出教育之外的意義與社會功能。

本文希望在過去對地方官學及蘇州區域研究的基礎上，以地方官學經營為主軸，討論宋代地方官學在地方社會發展中的一種可能性與趨勢，嘗試以「人」作為串連地方官學與地方社會的線索，作為對基層社會研究的嘗試。

第二章 吳學的沿革

蘇州，古屬吳國，秦爲會稽郡；東漢之後，由會稽郡轄地分錢塘江以西，增置吳郡；吳郡在兩晉及南朝時期，疆域曾數度更改，但仍沿用吳郡之名；至隋代，則改稱蘇州。唐代蘇州轄下有吳、長洲、嘉興、崑山、常熟、海鹽、華亭七縣；五代時割嘉興、海鹽、華亭另置秀州，其餘四縣仍屬蘇州，原吳縣則分地新置吳江縣。宋初，蘇州仍領吳、長洲、崑山、吳江、常熟等五縣，並以吳、長洲兩縣爲郡治；政和三年(1113)，蘇州升爲平江府；南宋嘉定十年(1217)，又分崑山縣濱海地區增設嘉定縣，自此領有六縣。²⁷

蘇州東面臨海，西接太湖，東北濱揚子江，地形屬湖泊淤積平原，東西北三面地勢略高，中央湖蕩、塘浦散佈，有「澤國」之稱；雖然這類地形容易發生水災，但卻也提供了優良的稻作環境。蘇州地理位置居水陸要衝，水陸交通便利，除了在經濟發達的浙西地區形成水路交通網，也能以運河、長江通達汴京、杭州等地，乃至透過海運與沿海各城市，甚至外國通商。蘇州自然環境有利於稻作生長，且具豐富的自然資源，交通便捷，復以唐宋以來人口成長迅速，種種因素均提供了蘇州農業與手工業生產及外銷的

²⁷ 脫脫，《宋史》卷 88(北京：中華書局)，頁 2174。

條件。生產事業與水陸交通運輸促成了經濟繁榮，刺激了城市發展，使蘇州成為全國重要商業中心。²⁸

唐代以降，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到宋代，江南已成為當時的經濟中心，蘇州在東南各郡中尤為富庶，諸如「蘇湖熟，天下足」、「天上天堂、地下蘇杭」等南宋時諺，皆描述了蘇州地區生產力之茂盛、城市發展之繁榮。經濟繁榮帶動文化發展，自五代十國以來，蘇州相對安定而少戰亂，優越的環境成為士大夫及其家族與達官貴人僑寓置產，乃至落地生根的選擇，也形成了此地特殊的地方社會形態。

五代十國時期，由於局勢相對平穩，江南因而匯聚了不少自晚唐以來避難流散的士人。這些士人原多任職於各政權及地方節度官員的幕僚之下，吳越歸宋之後，得利於政權的平穩過渡，這些士人非但得以以原有身份繼續在宋任職，在太宗時期開始大舉以科舉選官之後，其子弟也因原有的經濟與文化條件優勢，而能很快地轉業進士。不過，蘇州地區儒學士風之振起，主要仍迨到景祐年間范仲淹知蘇州，創立蘇州州學之後。學風日起，加上承平日久，此後蘇州士人躋身仕途者日眾，更不乏位居上位者。

此外，北宋前期，蘇州地區社會經濟文化長足進步，該地區一帶成為士大夫移居或置產的首選之地。北宋中期以後，蘇州地區因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所累積的文化基礎，吸引了眾多士大夫乃至達官顯貴移居此地，徙入者較高的文化水平，更促進了蘇州地區與其他區域文化的有機融合，並與蘇州當地的「菁英文化」發展形成良性循環，

²⁸ 梁庚堯，〈宋元時代的蘇州〉，《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頁334-480。

使得以科舉及第者爲代表的「菁英人物」，在蘇州地區大幅成長湧現。²⁹南宋時，蘇州更在被譽爲「士大夫淵藪」的七州府中，列居首位。³⁰

蘇州的政治、經濟條件及地域特質，讓當地充滿蓬勃的藝文活動，但相較於其他同樣被視爲文化繁盛的地區，如明州、溫州等地，蘇州的學術表現卻顯得較不突出。對此，過去學者雖然並未言明，但其實已經在研究中呈現出，即使蘇州是一個以經濟發展爲中心的城市，但仍舊因其蓬勃的藝文活動，如士人間往來交遊唱和、雅集等，被視爲文化城；然而，就一個文化城市而言，毋寧說蘇州是個藝文城，而很難說它是個學術城。在這樣的情況下，從景祐二年(1035)即存在在蘇州地區的吳學，遂成爲當地最重要的文化與教育中心。



²⁹ 鄧小南，〈北宋蘇州的士人家族交遊圈——以朱長文之交遊為核心的考察〉，《國學研究》3，頁451-488。

³⁰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20，頁26b。

第一節 創設與萌芽——北宋時期的吳學

宋仁宗景祐二年，吳學建立之前，蘇州雖有私人講學之風，但尚未出現正式的官立學校。羅處約的《祥符圖經》，編纂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雖然現已佚失，但明代盧熊所編纂的《蘇州府志》，引述了該書關於蘇州地區學校的記載，並加以考訂，認為唐代刺史李栖筠曾在蘇州設置學廬，但地點不詳；而大中祥符年間，蘇州地區雖設有祭祀孔子的至聖文宣王廟，但《祥符圖經》中並未提及當時蘇州是否已有學校之設。³¹朱長文所著《吳郡圖經續記》，成書於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是現存宋代蘇州地區最早的地方志，關於蘇州學校之設，則記載到：「吳郡昔未有學，以文請解者，不過數人。」³²

在正式的官立學校出現之前，蘇州地區的士人求學，乃至讀書業舉，則有賴私人講學。謝濤，自幼奇敏，曾經在蘇州陽山的澄照寺講學，為當時的長洲縣令王禹偁及吳縣縣令羅處約所器重，名顯一時。³³丁謂，大中祥符年間

³¹ 盧熊等撰，〈學校〉，《(洪武)蘇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明洪武十二年(1397)鈔本)卷12，頁1b。關於文宣王廟位置，《蘇州府志》據稱引《吳郡圖經》指該廟位於周城西側，但朱長文在元祐五年(1090)所做的〈蘇州學記〉中，則稱該廟在郡城西側。

³² 朱長文，〈學校〉，《吳郡圖經續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卷上，頁13b。

³³ 龔明之，〈謝賓客〉，《中吳紀聞》(上海古籍出版社，徐菊園點校，1986)，頁10。

曾任參知政事，幼時在蘇州就學，受教於程師孟的父親老郁先生；不過，丁謂當時仍是孩童，因此老郁先生的講學或許較接近童蒙性質。³⁴除了私人講學之外，蘇州鄰近的山林寺院間，也不乏士人讀書其中。《中吳紀聞》的作者龔明之，其曾祖龔宗元，少時即曾於蘇州近郊名勝虎丘山的虎丘寺讀書，「晝夜不絕，舉進士，爲鄉里首選，繼登天聖五年（1027）第」。³⁵此時士人就教於私人講學之所，或讀書自學於山林精舍的情形，與宋初的風氣相合。³⁶

蘇州州級地方官學的設置，在景祐元年（1034）一場嚴重的水災之後，某種意義上，可謂是因禍得福。

景祐元年，蘇州大水，「郡中災困之氓，其室十萬，疾苦紛沓」。³⁷當年六月，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出任鄉郡蘇州知州。他以工代賑，招募遊手無業者，加入疏導蘇州境內五河積水入海的工程。後來，本籍蘇州的范仲淹，爲了避籍而自請改任，詔徙明州。然而，蘇州水患持續不退，浙西轉運使因而進言，希望能再次借重范仲淹之長，將其調赴蘇救災。於是，當年九月范仲淹又再度受命，改知蘇

³⁴ 龔明之，〈丁晉公拜老郁先生〉，《中吳紀聞》，頁 20。

³⁵ 龔明之，〈曾大父〉，《中吳紀聞》，頁 20。

³⁶ 李弘祺，〈絳帳遺風——私人講學的傳統〉，收入《中國文化新論》第 2 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頁 343-410。劉子健，〈略論宋代地方官學與私學的消長〉，《宋史研究集》第 4 輯，頁 189-207。

³⁷ 范仲淹，〈與晏尚書〉，《范文正公尺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四部叢刊本，據江南圖書館藏明翻元刊本影印）卷下，頁 2a。

州。³⁸

蘇州的水患，使郡城東南象徵文教的孔廟岌岌可危。當洩導患水的計畫奏效，蘇州的水患與相關救災事宜，也在范仲淹重知蘇州當年逐步上了軌道。在此之後，始終以轄區文教事業為念的范仲淹，³⁹這才開始有餘裕思考蘇州的文教建設。首先，他想著手的，便是為地處隘陋的孔廟，重擇良地安遷。與此同時，范仲淹也曾嘗試邀請長於《春秋》的孫復(992-1057)至蘇州講學，⁴⁰但由范仲淹之嘆「庠序未立」可以推測，當時范仲淹可能未能成功邀請任何學者長駐蘇州講學，以裨益當地文教。

景祐元年，范仲淹的學生朱公綽、陳之武亦在蘇州。⁴¹

³⁸ 樓鑰，《范文正公年譜》，收入《范文正公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四部叢刊本，據江南圖書館藏明翻元刊本影印），頁14a。

³⁹ 詳見葛紹歐，〈范仲淹對宋代地方教育的貢獻〉，《紀念范仲淹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90），頁1511-1183。陳榮照，《范仲淹研究》（香港：三聯書店，1987）第6章，頁213-257。其他相關的范仲淹研究論著，均對范仲淹對地方文教建設的貢獻，多所著墨，此處不再贅述。

⁴⁰ 范仲淹，〈孫明復〉，《范文正公·尺牘》卷下，頁4b-5a。據《東軒筆錄》，范、孫兩人間曾有段淵源，孫復少時家貧，范仲淹在睢陽掌學時，曾助孫復在官學中補得一學職，每月可得俸錢若干以濟其困乏；此外，范仲淹也授孫復《春秋》，使其得以專意向學。見魏泰，《東軒筆錄》（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卷14，頁7-8a。

⁴¹ 范仲淹，〈孫明復〉，《范文正公·尺牘》卷下，頁4b-5a。

朱公綽爲北宋後期蘇州名士朱長文的父親，他少時從學范仲淹，「以辭章魁冠士林」；⁴²後長居蘇州，甚有名望，且朝野人脈關係頗豐富；⁴³陳之武亦爲蘇州大姓。⁴⁴朱、陳二人身爲范仲淹的學生，必然相當瞭解范仲淹對地方文教建設的願景，絕不僅是重奉孔廟，或嘗試透過私人力量，不定期邀請學者至蘇州講學而已；一如范仲淹過去宦歷中，在各地所推動的地方教育事業，他所謀求的，是更穩定、更能永續經營的學校。因此，兩人憑藉他們在地方上的社會聲望與人脈關係爲號召，翌年由朱公綽率州人，向知州范仲淹提出請求興建官學的建議。⁴⁵

蘇州新創設的地方官學，即是此後經歷兩宋、元、明、清而不墜的吳學。吳學校地以范仲淹在南園東南隅的私人產業爲基址，南園爲廣陵王錢元璪所建園林，爲蘇州名勝。⁴⁶慶曆間，蘇舜卿被罷黜後移居蘇州，曾提到吳學「草木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⁴⁷相傳，南園此地原爲范

⁴² 朱長文，〈朱氏世譜〉，《樂圃餘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卷9，頁2b。

⁴³ 關於范仲淹與朱公綽的師從關係，可參見鄧小南〈朱長文家世、事歷考〉，《北大史學》4，頁75-76；鄧小南〈北宋蘇州的士人家族交遊圈——以朱長文之交遊為核心的考察〉，頁452。

⁴⁴ 王安石，〈永嘉縣君陳氏墓志銘〉，《臨川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四部叢刊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明刊本影印）卷100，頁11b。

⁴⁵ 朱長文，〈學校〉，《吳郡圖經續記》卷上，頁11-12b。

⁴⁶ 朱長文，〈園第〉，《吳郡圖經續記》卷下，頁15a。

⁴⁷ 蘇舜欽，〈浪滄亭記〉，《蘇學士集》（上海：上海書店，1989，據

仲淹欲卜地而居之處，當時曾有陰陽術士聲稱以此地爲居，必踵生公卿，范仲淹回答：「吾家有其貴，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貴將無已焉。」遂就南園建學。⁴⁸吳學草創，規模尙簡，僅祭殿、講堂、泮池與齋室，就讀者才二十餘人。⁴⁹這樣的人數與規模，當時曾有人以爲，以南園之地建學太廣，范仲淹只是笑答道：「吾恐異時患其隘耳。」

⁵⁰

吳學並非慶曆興學之前最早請建之州縣學校，在此之前，孫奭在知兗州時，曾率先創建兗州州學，是目前各地建立州郡官學最早的紀錄；與范仲淹同時期，則有滕元吉在湖州所創設的湖州州學。⁵¹蘇州建學之議，經過范仲淹向宋廷奏請之後，獲准成立，此時距慶曆三年(1043)范仲淹上書十事，請「精貢舉」，以及慶曆四年(1044)仁宗詔天下郡縣皆建學，尙有將近十年的時間。學者一般認爲北宋大規模發展地方官學，始於仁宗慶曆四年，其實自仁宗即位至慶曆四年間的二十多年，便已開始，特別是在明道、景祐(1032-1037)這段時期。在這段時期，許多與地方官學

上海涵芬樓景印清康熙刊本重印)卷13，頁6a。

⁴⁸ 樓鑰，《范文正公年譜》，頁14b。

⁴⁹ 朱長文，〈蘇州學記元祐五年歲次庚午秋七月甲子朔建〉，《樂圃餘藁》卷6，頁4-10a。同篇文章收錄在《吳郡文粹》，記當時學者為三十餘人，總而言之，從學者仍甚少便是。

⁵⁰ 朱長文，〈學校〉，《吳郡圖經續記》卷上，頁14a。

⁵¹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47（北京：中華書局，中華書局點校本，2005），仁宗慶曆四年三月甲戌、仁宗慶曆四年三月乙亥條，頁3563-3565。

建學相關的基本制度與慣例，已經有了初步的萌芽，包括學田制度、賜《九經》、學規等等。⁵²吳學之設，正是在慶曆新政前的這一波興學前奏上。

吳學師資自景祐創設以降，水平為人稱道，由吳學出而入仕者亦濟濟不絕。⁵³除了師資、學生之外，對於一所學校而言，圖書同樣不可或缺。吳學草創時期，藏書未暇理緝，僅「廚之後廡，澤地汙晦，日滋散脫，觀者惻然」。⁵⁴慶曆元年(1041)，富嚴知蘇州，上任後見此，便與吳學學址所跨吳、長洲兩縣縣令商議，以吳學原有之積餘經費購置建材，在講堂南方建閣藏書，歷時七十餘日，計工一千兩百人次，命名「六經閣」。⁵⁵

仁宗明道、景祐年間，全國各地地方官員紛紛自發性發起建學，到慶曆年間，這一波漸成氣候的興學風潮，遂與北宋中期的政治改革運動扭合為一。在范仲淹所倡起的慶曆新政中，學校被賦予改革科舉「難察士德之弊」的重責大任，並寄望能藉各地地方官學，以落實「教本於學校，士察於鄉里」的期望，而這項政策也為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所繼承。從慶曆新政到熙寧變法，中央、地方官學被

⁵² 郭寶林，〈北宋的州縣學〉，《歷史研究》1988年第2期(1988.04)，頁81-83。

⁵³ 朱長文，〈學校〉，《吳郡圖經續記》卷上，頁11-12b。

⁵⁴ 張伯玉，〈六經閣記〉，《吳郡志》卷4，頁5b-6a。

⁵⁵ 王鏊等撰，《（正德）姑蘇志》誤將富嚴建六經閣植為其嘉祐中再守蘇州時事，實際上應是慶曆元年三月到四年十月間。《（正德）姑蘇志》（上海：上海書店，1990，收入《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續編，明正德刻本）卷24，頁1b。

宋廷視為國家政策的發展要點，赴官學就讀也成為士人為能入仕所尋求途徑之一。

吳學生員如同吳學聲名，不斷擴張，⁵⁶在蘇州，願入州學者踴躍，⁵⁷慶曆七年(1047)，吳學生員已有百人員，不只本州人就讀，亦有他郡至蘇州就學者。⁵⁸仁宗嘉祐二年(1057)，也就是吳學創設二十多年後，司馬光在〈并州學規後序〉中提到，當時并州知州以太學、河南府、大名府、京兆府及蘇州五所官學學規，作為重定當地官學學規的範例，說明蘇州州學在當時被視為地方官學的典範之一，而受到其他地區的重視。⁵⁹范仲淹當年的笑答，五十多年後果然成真，然而吳學生員不斷增加後，所連帶造成的校舍不足、傾陔褊迫等問題，成了吳學亟待解決的難題。

為解決就讀生員增加，導致校舍不敷使用的問題，熙寧二年(1068)，秘閣校理李紱知蘇州時，曾以南園地擴建郡學。⁶⁰到元祐年間，朱長文(1039-1089)任吳學教授時，赴吳學就學者更倍增於初創之時，州學學舍又再度陷入了「傾陔褊迫，寒薄暑燠，諸生病之，來者無所處」的窘境。

⁵⁶ 朱長文，〈蘇州學記元祐五年歲次庚午秋七月甲子朔建〉，頁 4-10a。

⁵⁷ 朱長文，〈學校〉，《吳郡圖經續記》卷上，頁 11-12b。

⁵⁸ 龔明之，〈王教授祭學生文〉，《中吳紀聞》，頁 125。

⁵⁹ 司馬光，〈并州學規後序〉，《溫國文正公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常熟瞿氏藏宋紹興本影印）卷 64（四部叢刊本），頁 12a。該文撰寫時間據《傳家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卷 69，頁 8b。

⁶⁰ 朱長文，〈學校〉，《吳郡圖經續記》卷上，頁 11-12b。；《（正德）姑蘇志》卷 24，〈學校〉，頁 2a。

⁶¹當時，教授朱長文與吳學學職同僚商議，希望能再次以南園餘地，增建學舍齋廬；然而屢屢請命，當時的知州與路級長官也都只能無奈表示，財用不足，愛莫能助。

吳學的困境，因元祐四年(1089)范仲淹三子范純禮(1031-1106)過鄉祭祖，而出現轉機。

元祐四年，范純禮受命出任制置江、淮等路發運使，主管江、淮六路漕事。他藉赴任途經蘇州之便，返鄉祭祖，並赴吳學所設范文正公祠堂，祭奠父親范仲淹。⁶²朱長文便趁此機會，將學舍不足且亟待修葺一事告知范純禮。范純禮除自朱長文處獲悉吳學情況，可能也從剛由潤州調任知蘇州的王觀處得知，因生員眾多，校舍不敷使用的地方官學，不只吳學，潤州州學也有校舍殘舊的問題，而這兩學校都是早年范仲淹在外任知州時所創建的。⁶³

范純禮將這兩所學校的景狀，一併向宋廷上奏，請撥經費修建其父仲淹所創蘇、潤之學。范純禮代蘇、潤二學請命重修學舍，宋廷批准並撥下經費，但來源各有不同——吳學獲撥蘇州商稅的收入，以為修建資金；潤州州學在早先上奏請求重建時，曾獲賜度牒十紙，出售以得經費。吳學擴建耗時一年，興築工程歷經劉琨、王觀兩知州，以因犯罪而遭刺配入廂軍服勞役者為工，計萬餘人次。整建後，吳學建築規模較前擴增二至三倍，整建範圍包括講堂、

⁶¹ 朱長文，〈蘇州學記元祐五年歲次庚午秋七月甲子朔建〉，頁 4-10a。

⁶²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06，〈哲宗元祐二年冬十月丙午〉條，頁 9890。范純禮過家上冢事，見樓鑰，《范仲淹年譜》，頁 14b-15a。

⁶³ 朱長文，〈蘇州學記元祐五年歲次庚午秋七月甲子朔建〉，頁 4-10a。

學生住宿齋室、供奉范仲淹與胡瑗的祠堂、校試廳，乃至學校生員日常所需之廚房浴廁等。⁶⁴



⁶⁴ 朱長文，〈蘇州學記元祐五年歲次庚午秋七月甲子朔建〉，頁 4-10a。關於吳學整建的經費來源，《（洪武）蘇州府志》、《（正德）姑蘇志》皆將潤學獲授之度牒，誤作為撥給吳學之經費。

第二節 重建與發展——南宋時期的吳學

建炎四年(1130)，金兵南犯，平江府慘遭屠掠，府城在兵燹之後幾乎全毀，所存「惟覺報小寺及子城角天王祠」。⁶⁵宋廷遭罹兵禍後，偏安江南，一方面隨時提防金人進犯，一方面忙於重建各式迫切的行政運作、條令規章，無暇顧及州縣教育與建設。⁶⁶汪應辰在一則墓誌銘中，曾提到紹興五、六年(1135-1136)，長江沿岸一帶官學的景況：「時沿江猶未解嚴，戍兵往來類多托宿於學，生徒解散，學官備員而已。」⁶⁷由此也可以想見同在長江沿岸的平江府歷經戰禍後的處境不會好太多。

平江府一切設施，皆在災後隨事草創。雖然吳學逐步在斷垣殘壁中重建，但僅能勉強支持課程講授與生員日常活動，無暇旁及象徵教化的祭孔祠廟，每年春秋祭奠只能

⁶⁵ 范成大著、汪泰亨等補編，《吳郡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宋紹熙三年(1192)修，紹定二年(1229)續修，據民國十五年(1926)吳興張氏擇是居叢書景宋刻本）卷7，頁1。

⁶⁶ 這點在趙鐵寒，〈宋代的州學（上）、（下）〉，《大陸雜誌》7卷10期、11期（1953）；袁征，《宋代教育》，頁48；以及周愚文，《宋代的州縣學》（台北：國立編譯館，1996），頁7，都針對此時國家官學政策有過討論。

⁶⁷ 汪應辰，〈左奉議郎汪公墓誌銘〉，《汪文定公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1997，四庫存目叢書據明嘉靖二十五年夏浚刻本）卷12，頁16a。

因陋就簡，以既有克難學舍空間應付一時。⁶⁸紹興十一年(1141)，寶文閣直學士梁汝嘉(1096-1154)奉命再知平江府，便與同僚商議，以府內舊有遺材與公費盈餘，僱工整建祭祀孔子的大成殿，並修復范仲淹、胡瑗祠堂。⁶⁹據說重建當時，有巨木浮海而至，尺寸大小正合大成殿中樑所需，傳為異談。⁷⁰

紹興十四年(1144)二月，寶文閣直學士王喚自請出知平江府。⁷¹當時，平江的戰後重建仍在進行中，陸友仁在《吳中舊事》中記載：「(王喚)紹興初知府事，峻於聚斂，酷於用刑，然其規為亦有可取者。兵火之餘，故墟瓦礫山積，乃錄八城小舟，出必載瓦礫以培塘，人以為便。石之破碎者，積而之以泥官舍，不賦于民而用有餘。」⁷²當年四月，

⁶⁸ 鄭仲熊，〈重修大成殿記〉，《吳郡文粹》（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卷1，頁14b-15b。又，梁汝嘉自言初守平江時，雖見學校歲時祭奠儀式因陋就簡，但當時並未立即修復校內祭孔祠廟。據《吳郡志》，梁汝嘉初守平江在紹興七年時，可見即便是很形式上的恢復，當時吳學已經逐漸開始重新運作。

⁶⁹ 鄭仲熊，〈重修大成殿記〉，《吳郡文粹》卷1，頁14b-15b。據《吳郡志》卷11，梁汝嘉曾在紹興七年九月到紹興八年七月，及紹興十年六月到紹興十一年七月知蘇州，頁15。

⁷⁰ 周必大，〈寶文閣學士通奉大夫贈少師梁公汝嘉神道碑〉，《文忠集》（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1，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卷69，頁4。

⁷¹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51，頁4a。

⁷² 陸友仁，《吳中舊事》（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百部叢刊函海本）卷1，頁13b。

王喚重修吳學。此番整建歷時五個月，主要在講堂、學齋、生員日常所需庖廚衛浴等建築，戰後吳學整體規模的重建，到此時才算大體完成。⁷³

紹興年間，吳學經過戰後重建之後，一直維持著穩定的營運，不時有關路疏池、立庭建閣等興築，但多是在舊有規模上擴建增綴。紹興二十三年(1153)，隱居平江的前知府向子諲將十五年積俸約三百萬，悉數捐入吳學，作為養士藏書之費。⁷⁴乾道八年(1172)，吳學諸生員考稽圖籍，尋訪耆老，作教授題名記，刻於吳學教授廳。翌年，知府丘崇造直廬。⁷⁵淳熙二年(1175)，知府韓彥古創采芹、仰高二亭；⁷⁶其中，采芹亭一直到元代，都是官員造訪平江地區時的客居停留之處。⁷⁷淳熙十六年(1189)，郡守趙彥操增造御書閣、五賢堂。御書閣乃就毀於戰禍的六經閣舊址所建，內奉有宋高宗皇帝所賜御書石刻六經，過去累任知府均曾欲重建，但直迨到趙彥操任內才完成，據稱其建築蔚為吳學壯觀；五賢堂則奉有陸贄、范仲淹、范純仁、胡瑗、朱長文五人。⁷⁸

⁷³ 鄭億年，〈平江府修學記〉，《吳郡文粹續集》（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卷3，頁1b。

⁷⁴ 汪應辰，〈徽猷閣直學士右太中大夫向公墓誌銘〉，《汪文定公集》卷11，頁8a。向子諲紹興八年知守平江，八月到任，十一月即因反對宋金議和極力求去，從此隱居鄉里。

⁷⁵ 范成大《吳郡志》卷4，頁1。

⁷⁶ 范成大，《吳郡志》卷4，頁1-2。

⁷⁷ 鄭元祐，〈重修平江路學記〉，《吳郡文粹續集》卷3，頁18b。

⁷⁸ 范成大，《吳郡志》卷4，頁2、6。

紹熙五年(1194)到慶元二年(1196)間，吳學創設了帶有獎助，並兼具公益性質的「吳學義廩」，發起者為當時擔任教授的倪千里。倪千里紹熙四年(1193)出任平江府學教授時，深感吳學財務狀況不足以供應支持學校運作、供養生員，於是重新整理吳學名下產業，希望能掌握吳學財務情況，設法解決吳學的經濟問題。⁷⁹透過清整受隱沒或帳務不清的學產，倪千里不只解決了吳學經費不足的問題，甚至還能在正常收支之外，多出額外的經費，因此教授倪千里便與吳學學正、學錄、錢糧官等同僚商議，創設兼具贊助、救濟性質的吳學義廩。⁸⁰

嘉泰四年(1204)到開禧二年(1206)，有鑑於吳學受限於經費，每日能提供給的生員補貼額度不到百人，教授唐仁傑為能擴大吳學養士生員員額，遂利用歷任教授任內所積義廩錢，及節省學校開支所攢存下的款項，共八千貫文省，委請吳學學職人員尋訪，選購平江城及近郊房產、田地十筆，以其房、田租收入增益用度，擴充生員員額。⁸¹然而，到了嘉定十一年(1218)，吳學又因為養士開支日益增加，而出現經費不足的問題，這次則是由判知平江府趙彥橚撥官田三百餘畝，作為吳學養士之助。⁸²

自紹興年間的重修後，事隔八十餘年，吳學分別在紹

⁷⁹ 戴溪，〈吳學義廩記〉，《吳都文粹續集》卷3，頁24a-26b。

⁸⁰ 創設義廩，見〈吳學義廩記〉，《吳都文粹續集》卷3，頁24a-26b。

⁸¹ 〈吳學續置田記〉，收錄於北京國家圖書館編，《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北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3）冊2，頁300-315上。

⁸² 謝南，〈平江府添助學田記〉，《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2，頁324下-327。

定元年(1228)十一月，及淳祐六年(1246)二月再度重修。紹定元年的整建，導因於寶慶三年(1227)秋天的大風雨。在這次風災中，「殿閣、堂館、直舍、門廡、齋亭皆摧圯欲壓」，校區主要建築都受到嚴重損壞。⁸³此番整建可能迫使州學教授不得不重新整理府學財產，以尋求整建經費來源。當時教授汪泰亨以緊迫盯人之勢，試圖解決吳學與地方土豪間懸宕十九年，地至千餘畝之廣的土地糾紛。汪泰亨起初向平江府提出申告，希望能獲得平江府方的行政協助，取回田地；但因對手狡猾健訟，復田事件演變成撲朔迷離的土地訴訟案，一路由州級、路級上告到尚書省，最後甚至訴諸當時的宰相史彌遠(1164-1233)，才如願取回田地。復田所得，加上在任提點刑獄公事、提舉常平公事、知府等官員的捐助，金額在四百萬錢以上，費時八個月，建屋七百五十間，規模超越紹興十四年戰後重建。⁸⁴淳祐六年的整建，則是在紹定重建的基礎上，由府學教授何德新向知府魏峻提出，由府方撥款五萬緡，整葺年久失修的建築。⁸⁵

到南宋理宗晚期，隨著宋、蒙間的緊張升高，大小戰

⁸³ 范成大，《吳郡志》卷4，頁8a。

⁸⁴ 此案的公文內容為平江府學刻石立碑，見〈給復學田公牒一、二〉、〈吳學復田之記〉、〈給復學田省劄〉，收錄於《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2，頁338下-342、344下-345上、345-348；以及吳潛，〈脩學記〉，《吳郡志》卷4，頁8a-9a。另，由李如鈞先生提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給復學田公牒一〉碑文拓本，特此向李如鈞先生及傅斯年圖書館致謝。碑文詳細案情與過程，因涉及吳學財務經營，一併在下節中討論。

⁸⁵ 李起，〈淳祐修學記〉，《蘇州府志》卷47，頁42。

事不斷，國防軍需成為宋廷分配資源時的首要考量，各地官學、書院過去在經濟上所享有的種種優假，開始受到擠壓，吳學當然也不例外。淳祐十一年(1251)與景定二年(1260)，在宋蒙對峙的大環境下，吳學兩次因與佃戶間的田租糾紛而遭遇經濟困境。前者起因於佃戶不甘向吳學繳納新懇田地田租，而妄稱田租需繳納至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所以充軍餉，希望以此讓吳學方面知難而退。後者則因豪戶滯納田租，加上天災影響收成，連帶影響吳學需繳供軍需使用的租糧。兩事都因涉及國防單位，而使事情在處理上更為棘手，幸而兩次吳學都能得到當時的總領錢糧所主管支持，在不損及吳學權益的前提下順利落幕。這時距南宋亡國，只有二十年左右的時間了。

恭帝德祐元年(1275)，也是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冬天，顯文閣直學士潛說友當時知平江府，幾乎是南宋平江最後一任知府；當元將伯顏率領兵馬軍臨平江城下，潛說友也率先棄城逃亡了。當時被元廷任命為宣撫使的游顯，親自來到平江城，宣告元廷願降者赦的政策；經過一夜考慮，宋都統王邦傑便決定率平江府軍民舉城歸降元政權。⁸⁶

游顯負責平江地區初期的接管任務，在穩定平江地區民心、安頓軍隊將士之後，他所做的下一步，便是興振學校，「(游顯)暇日下車庠序，禮祠先聖，勉勵儒生，繼粟繼肉，均得其養。學舊有田，多入于兼并，公使各復歸期，于深衣韋帶之士，莫不欣戴菁莪樂育之恩」。⁸⁷至元十五年

⁸⁶ 《元史·世祖本紀》卷6，頁171。

⁸⁷ 陳立武，〈中書右丞浙西道宣慰使游資德生祠記〉，《吳都文粹續集》卷三，頁57a。

(1278)，游顯調升，持節浙右。至元十九年(1282)，受詔入覲，被任命為中書右丞浙西道宣慰使，途經平江地區，巡視吳學，除再次勉勵生員外，亦出資整建學校，裨「政事教化可以並行而不悖」。平江百姓感念游顯，在吳學中為之立生祠。⁸⁸吳學的營運，雖然確實受到宋末元初戰亂影響，特別是學產田地可能在宋末就開始因經濟狀況不佳，或為應付宋廷徵餉之故而變賣，甚至遭到地方人士侵佔，但吳學並未受宋元政權交替而停擺，至少仍有生員在學校就讀，情況甚至比兩宋之際幸運許多。⁸⁹



⁸⁸ 陳立武，〈中書右丞浙西道宣慰使游資德生祠記〉，《吳都文粹續集》卷三，頁 57b。

⁸⁹ 陳立武，〈中書右丞浙西道宣慰使游資德生祠記〉，《吳都文粹續集》卷三，頁 57a。

第三章 吳學的校務經營

在中國官學教育的發展上，宋代具有關鍵性的轉折意義。爲了實現「養士、取士合一」的理想，宋廷三次嘗試將取士與教育結合，甚至希望以教育取代科舉，雖然其改革並未扭轉官學教育爲科舉制度主導之勢，但諸項宋代官學教育的特色，如地方官學普遍設立、學田制形成、教官選任與路級教育管理機構確立等，與其所立下之規模，卻成爲此後中國教育的主要特質。⁹⁰除卻科舉制度這個與地方官學相應存在的前提條件不談，學田制度是支持地方官學經營的主要元素；然而，若空有田產而無有爲者妥適經營，亦是枉然。本章的主旨，即在討論吳學的經濟情況、校務的經營，並觀察教授在其中逐漸凸出的角色。

目前的研究，對宋代州級官學的普遍經濟狀況，已經有了概括性的描繪。⁹¹一般而言，地方官學的主要經濟來

⁹⁰ 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袁征，《宋代教育》。

⁹¹ 主要可見福澤與九郎，〈宋元時代州縣學產考（一）、（二）〉，《福岡學藝大學紀要》第8期、第9期（1958、1959），頁27-42、27-38。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頁144-151。周愚文，《宋代的州縣學》（台北：國立編譯館，1996），頁97-126。漆俠，〈宋代學田制中租佃關係的發展〉，《求實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源，由宋廷所賜學田所構成，學田出租給佃戶耕種，收取田租以支應學校用度。除了各州府建學時，由宋廷所賜土地外，學田也包括建學後由各地地方官府所撥、學校自行購置或地方人士捐獻的田地。在學田之外，各地官府也有以出租房廊之租金、刻書印刷出售的收入，或管理公倉的節餘，甚至酒稅等專賣事業權利金等各種方式，增益地方官學經費。此外，地方官學經費，也可能透過其他方式獲得：由地方官員籌措或捐助；地方官員將爭訟不決的產業充公，撥為學產；由地方官學向當路轉運司暫借款項，以賤價收購鄰郡爭訟產業，並以地租清還債務；或商請地方父老贊助，以供給學校生員伙食。

做為地方官學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學田養士」是宋廷支持地方官學發展的基本政策。這項政策最早始於乾興元年(1022)十一月，知兗州孫奭(962-1033)擔心離任後，所建學校將因經費困乏而無以為繼，遂向宋廷請給田地以支持學校用度，獲賜田十頃；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諸州級給學田蓋始此。」⁹²地方官學建學賜田自此形成慣例，在景祐、寶元間(1034-1040)，凡州郡立學，即比照兗州州學例，視學校規模大小，分賜學田五至十頃不等；慶曆四年(1044)，宋仁宗接受范仲淹的建言，詔令天下州郡建學，獲賜學田的地方官學，範圍更為擴大。

1982)，頁 160-175。Yuan Zheng, *Local Government Schools in Sung China: A Reassessment*,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34, No. 2.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Summer, 1994), pp.193-213.下文對學田的概略介紹，引自上述諸作。

⁹²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99，乾興元年十一月庚辰條。

熙寧四年(1070)，宋廷再度下詔，各路設有教授的州府，均賜學田十頃充學糧；原有土地不及十頃者，則增至十頃；超過十頃者，聽任維持原狀。徽宗崇寧興學時期，在蔡京的主導下，更將各路常平司所屬戶絕田地、產業，撥充學校養士用度，且向下擴及縣學。然而，崇寧興學受黨爭傾軋影響，政策朝令夕改，如同兒戲，同時興學運動也因本身發展過度膨脹，除了導致學田管理與經費運用弊病叢生，更壓迫到地方上其他經濟需求。⁹³再者，宋金戰爭致使宋廷財政窘迫，原本隨天下三舍法而擴大推行的學田養士政策，因而在推行不久之後又迅速萎縮，撥予各地官學養士之用的學田面積也大幅縮減，回復到天下三舍法推行前的規模。

隨著宋金戰事逐漸緩和，紹興五年(1135)之後，宋廷又開始陸續撥下田產給各州縣地方官學；但各地學田產業真正重新回復，用以支持地方官學的開支用度，仍要待到紹興議和之後。此後，各地地方官學學田，因各地官府撥下籍沒入官、寺絕田產及無主荒田，而陸續擴增；此外，為維繫州縣地方官學的營運，或擴大生員員額，也開始有州縣學自置學田、鄉民集資購田等方式出現。

學產管理方面，在地方官學發展初期，地方官學事務，尤其是財務管理，主要由州縣地方官負責；後為加強對地方官學的財務管理，則改由各路轉運使負責主持地方官學的經濟事務。在徽宗崇寧二年(1103)，為利天下三舍法的推行，且為因應各地地方官學日漸龐雜的事務，宋廷設立了路級教育管理機構「提舉學事司」。此後，地方官學的財

⁹³ 周愚文，《宋代的州縣學》，頁 101。

政事務則轉由提舉學事司負責；而在統籌性事務之外，宋廷及各地州府也派遣官員及吏人，擔任「錢糧官」或「庫子」，主持各校的財務會計工作，審查地方官學的各項開支情況。

養士學田或地方官府各種常態性用以籌措地方官學經費的措施，基本上確保了地方官學經營的穩定與延續。同時，這些用以資助地方官學生員基本生活的補貼，無形中也擴大了就學生員的來源及宋代政府取士擢才的範圍。然而，這些支持地方官學發展的經濟政策，所面臨最大的難題，也來自這些經費的官方性質。學田或其他經費收入，常遭地方官府挪做他用，學田也時常有受地方豪強或形勢官戶，乃至地方官吏本身侵佔的問題。因此，針對地方官學經濟情況，也有學者認為，由於終宋之世，宋廷均未專設教育經費預算，加以宋代地方官學資金始終短缺，即便有學田，地方官學經費相當程度仍賴私人捐助，或被地方官府將負擔轉嫁給當地人士。正因為地方官學的財政、建設，與多數用以籌措官學經費的措施，始終受控於國家或地方官府，學校財政不僅不獨立，學產更時常被當地官府移作他用，或被其他力量侵佔。這樣的不穩定性，導致以致所有的教育活動都被視為是官方的恩賜；唯有地方官學層級越高，或越接近政治中心，才能享有越好的待遇。⁹⁴

⁹⁴ Yuan Zheng, *Local Government Schools in Sung China: A Reassessment*, pp.193-213.

第一節 吳學財務概況、經費運用與稅務問題

吳學的經濟情況，大致不脫前文所述宋代一般地方官學的基本發展。關於吳學經濟狀況或財務經營的資料，屬於北宋者，大多毀於建炎兵禍；目前可見的部分，大多是保留在石刻文獻中，年代集中在南宋中、後期。透過這些石刻資料，有助於在現有對宋代學田問題的概括討論之外，更深入而細緻地瞭解地方官學經濟的實際情況與教育之外的校務經營。

吳學創建之初，曾獲賜學田五頃，此後隨著歷代詔令增賜田地，或地方官府撥下沒官田產等，用以支持吳學的養士資產逐漸累積，到南宋已相當可觀。然而，擁有可觀的財產數字，卻不等於擁有用度無虞的經濟資源。光宗紹熙四年(1193)，倪千里出任吳學教授。初到任，倪千里首先著手瞭解吳學的財務情況，卻發現吳學財務狀況不足以供應支持學校運作、供養生員，因此決定從整理查核學產開始，希望能解決吳學面臨的財務困境。⁹⁵

吳學產業的情況繁瑣又龐雜，整理學產的工作一直到慶元二年(1196)正月才完成，並立石為證。經過清查，吳學能夠用以支應學校開支用度的產業，有土地近 11195.43 畝，其中包括苗田、蕩田、圍田，也有出租民眾經營漁業的茭蕩、莊地所附屋舍等，而這筆土地數字還不包括未出租也未開墾的土地，也不包括因碑文缺漏所不能納入統計的產業。在納租正常的狀況下，這批產業扣除砧基簿已失

⁹⁵ 戴溪，〈吳學義康記〉，《吳都文粹續集》卷 3，頁 24。

載納租人或租米數的部分，總計每年可得白米、糙米或麥等穀糧近 2287.05 石。除了穀糧之外，吳學收入還包括隨租米徵收的帶收錢、糜費錢，及遺利錢等雜費，每年 573 貫 926 文，及出租田地、土地、房屋等租錢，每年 1954 貫 600 文以上，再加上每月提舉常平司所撥下的一筆小額經費，為數相當可觀。⁹⁶

但是，這番清查也發現，因為田籍記錄不清，到慶元二年時，吳學已有 639 畝餘的土地下落不清，約佔吳學可知田產的 5.7%，每年至少損失 9.3% 的租糧，而這還是在其他產業都能如數收租的前提下，所構成的最低損失。⁹⁷不過，除了發現損失，學產清查也有意外的收穫。有三筆土地過去可能長期受地方豪戶或官戶包佃，透過這次學產清

⁹⁶ 上述各項數字，據〈吳學糧田籍記（二）〉，《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頁 285 下-292 上。《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 收錄《江蘇通志稿》所刊之〈吳學糧田籍記〉內容多處有缺漏字，且前標題為「二」，疑前尚有部分碑文內容，因此以內容所統計數字，與碑文最末慶元年間所統計有出入，此處除土地畝數為目前所見資料之加總外，其他數字引用慶元二年碑文最末之紀錄。此外，很可惜在常平使府撥款數字部分，有許多缺漏，只能得知府學每月從常平使府得到一筆經費，但不知數目與名目。

⁹⁷ 倪千里〈吳學糧田籍記〉，《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頁 291-292。〈吳學糧田籍記〉列出各種不同收入明細，同時也條列下落不明的土地，並註錄其往年收租額。根據碑文所提供的資料，計算出府學因為土地下落不清，估計每年約損失米糧 212.83 碩，約為當時一年可收租糧量的 9.3% 的。此處 9.3% 是就租糧總量而言，未折算白米、糙米與麥當時不同的價格。

查，吳學派出催租人與甲頭，要過去租佃這些被包租土地的佃農，各自至吳學，直接與學校重新訂立租佃田地的契約。新的契約由佃農直接將田租繳予吳學，中間不再經過包佃田地的「二地主」，⁹⁸吳學因此能較過去獲得更多的田租收入。

這三筆重新與佃戶立約的土地中，崑山縣全吳鄉一筆2400畝的土地，在處理的過程中，尤為曲折。

這筆土地，原由韓蘄王府幹人郁明所佃；蘄王即南宋名將韓世忠，由於韓世忠在南宋初的功績，韓世忠及其後人在平江府相當具有影響力。正因為有韓蘄王府的勢力作後盾，郁明也才能以官戶幹人的身份，長期違法承佃學田；甚至可以大膽推測，郁明應是代蘄王府承佃這筆土地，並在包佃學田後，以一般田地的租額轉租其他佃農，以收取包租學田租額與實際所收租額間的差額，以為韓蘄王府牟利。龐大的利益讓「浮浪不根」的朱仁眼紅，在諸豪猾之徒的慫恿煽動及經濟支持下，以蘄王府為官戶，身為蘄王府幹人，郁明不符合承佃資格，於理不得承佃性質屬於官田的學田為由，由朱仁出名上告官府，爭佃學田。

此案乍看是郁明與朱仁兩民爭佃田產，其實卻暗藏玄

⁹⁸在宋代官學體系中，學田是學校固定的經費來源，學田多採取租佃制，由當地佃戶承佃，依時繳納田租，學校則以田租收入支應基本開支。漆俠指出，一來由於學田土地零碎，管理不易；二來，也因為官田租額較低，地方官紳豪戶希望能藉包租官田，再以一般租額轉租小農佃戶的方式，牟取差額之利，因而出現所謂「二地主」。漆俠，〈宋代學田制中封建租佃關係的發展〉，《求實集》，頁160-175。

機。蘄王府幹人郁明所以被默許非理承佃學田，部分可能是由於蘄王府勢力的背後支持。過去官府或吳學對於這類藉背後形勢官戶勢力包租學田的情況，有所忌憚，才使學田處於長期被郁明這類人包占租佃權的情況，得過且過。然而，朱仁能夠在豪猾之徒金援下，以爭佃訴訟挑戰郁明背後的蘄王府，其實也反映出顯赫一時的蘄王府勢力，隨著時間過去而逐漸轉弱。這樁官司，一則是爭訟連年，將影響吳學田租收入，二則不論此官司孰勝，吳學產業似乎都會繼續蒙受損失，對吳學來說，若能藉雙方爭佃官司的機會，得回學田租佃的主控權利，又不至於直接得罪蘄王府，再好不過。因此，紹熙五年(1194)，吳學教授倪千里便與其他學職人員、學生聯名遞狀，向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黃通提出申告，請求將該田地收回，由吳學自行出佃。

在此事中，倪千里作為一名教授，利用二地主與他人爭佃學田的訴訟，取回了吳學的產業。該田地除了原本可獲得租額之外，每年竟可多獲得 300 足石的糙米。該地原有租額，仍用以支應吳學的日常用度，此外倪千里又以吳學自行出佃田地所額外獲得的收入，創置了「吳學義廩」，使吳學學產在養士之外，增添了公益用途⁹⁹。

妥善經營學校，除了必須確實掌握學校的財務情況，也要能夠善用校務積餘經費轉投資，為學校開源。嘉泰四年(1204)，教授唐仁傑到任之初，吳學受限於經費，每日能提供資助的生員名額，不及百人。為擴大可資助生員員

⁹⁹ 倪千里，〈吳學糧田籍記〉，《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頁 287-288。

戴溪，〈吳學義廩記〉，《吳都文粹續集》卷 3，頁 24-26b。關於吳學義廩，將在下一章詳細討論。

額，教授唐仁傑乃利用歷任教授任內所積義廩錢，及節省學校開支所攢存下的款項，共 8000 貫文省，委請吳學學職人員在平江城及近郊尋訪合適田業。這筆積餘經費的主要來源義廩錢，正是來自慶元二年教授倪千里所創設的吳學義廩。從嘉泰四年到開禧二年(1206)，唐仁傑一共以 6207 貫 955 文九十九陌，為吳學典買入十筆土地約 504 畝，及瓦屋 5 間，每年估計可收租米 579.527 碩，及房屋租金 43 貫文足。這些投資確實對吳學養士頗有助益，兩年之內，吳學除了增收生員之外，也用這些投資所帶來的收益整葺府學。¹⁰⁰

利用學校的積餘資金購置產業以為投資的想法，其實在前任鄭姓教授任內，即已開始著手進行。鄭教授在任時，曾向當時的判知平江府張巖提出申請，希望將吳學積餘經費委託官府，代為購置田業。此事雖得張巖批准，但因受委任承辦官員的延宕，反使吳學選置田產一事中途流產，添購學產以擴增生員員額的計畫，也遭擱置。迨唐仁傑到任，認為這筆吳學積餘現錢，若不能善加運用，盡快添購合適的田業，很快便會耗散流失，因而不待平江府派出任其他官員處理此事，即先委託吳學學正、學錄、直學等學職人員在平江府近郊挑選適宜投資的田業。

由地方官學自行購置的產業，當然屬於學產的一部份。根據政和二年(1112)詔令，地方官學學田可免除夏秋

¹⁰⁰ 此處金額為 1 貫為 990 文的九九陌；每年所收租米為 445.79 石，以百三十合斗計算，而得出 579.527 石。關於教授唐仁傑為吳學置田事，引自唐仁傑〈吳學續置田記〉，收錄於《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頁 300-315 上。下文相關內容均引自此處，不一一贅註。

二稅，¹⁰¹但由學校自行購入的田產，所能得到的免稅優假，並未隨著田業購入而自動生效，必須由學校主動向地方官府提出申請。因此，嘉泰四年到開禧二年，唐仁傑陸續為吳學購置入房舍、田產後，也依次向平江府呈報這些田業，並提出免稅申請。

吳學置田的例子，為地方官學自行購置的產業，如何正式轉為學田，提供了相當詳細的例證。免稅申請由教授、學校重要學職人員，及受派任兼管地方官學財務的錢糧官共同署名提出。唐仁傑除了請免二稅之外，也同時向平江府提出了請免交易「稅契錢」的申請。申請文件條列請免二稅產業的詳細資料，包括田產字號、面積、土地四至位置、租佃者與租米數或折納金額，以及購置時間、金額及該產業簡單來歷，並附上契書。平江府收到申請後，會先向該田業所在縣衙及牙契庫核實勘對田業的稅籍、交易資料。經平江府審核評估，同意蠲免該田業二稅之後，便發出公文通知該田業所在縣份，註銷其二稅版籍，且要求縣級承辦官員配合協助處理田業交易、過戶等事宜，並照會牙契庫，免收交易的稅契錢，同時也發文照會吳學。

倪千里清整吳學學產，及唐仁傑為吳學添購產業二事，若分別討論，乍觀或許會得到「宋代的地方官學時常處於財用不足的情況，以致於主事的教授乃至地方官員，必須不斷為學校用度尋求新的來源」這類的結論。然而，若合併觀之，會有不同的發現——養士員額與學校養士經費間的關係，實際上猶如「雞生蛋，蛋生雞」，在地方官學的經營中循環不已。地方官學的經營者，無論是地方官員

¹⁰¹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崇儒》（北京：中華書局，1957）2之19。

或教授，往往嘗試著開源節流，希望能藉此增加學校能資助的生員員額，卻又因生員不斷增加，得繼續尋求新的經費來源。可能造成此情況的因素，其實與地方官學經營的良丕背後所被賦予的意義有關。從功利角度著眼，乃在於就讀於地方官學的生員人數，相當程度上被視為地方官員與官學教授的教化績效；另方面，就教育理想而言，地方官學所能接受的學生人數越多，也代表著能作育更多的人才。

當吳學這樣擁有豐富經濟資源的地方官學，卻再三在碑記中透露出財用不足的訊息，我們必須意識到，所謂財用不足，其實是相對性的。教授唐仁傑曾在呈送給平江府的公文中提到，吳學所有田地雖廣、租米之額雖多，但「所收之實甚寡」，若遇天時不佳，有時甚至「未必能周一歲之費」。¹⁰²從正面理解，很容易得到吳學財物窘困的結論，但事實上的情況是，吳學非但沒有財務短缺，甚至還累積了一筆不小的經費，唐仁傑此言目的是在說服平江府方面同意吳學所提出的免稅申請。若是再進一步思考其他吳學表示財用有虞的情況，更可以發現所謂不足，是相對性的，通常吳學在一般的校務營運之外，出現其他需求，好比希望能增加更多的生員員額、希望能建造或修葺校舍等，而原有的經費不足以支應這些新增開支，便會向外發出學校財用不足的訊息。至於天時不佳，導致欠收，連帶影響吳學的財務用度，這種情況則是整個區域性甚至全國性的經濟短缺，不適宜以此為吳學財用不足的討論。同時，從養

¹⁰² 唐仁傑，〈吳學續置田記〉，收錄於《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2，頁300-315上。

士員額與校務經費的運用出發，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像吳學這樣一個已經擁有豐富的經濟資源的地方官學，無論是地方官員或負有學校實際經營權責的教授，仍會透過地方官府撥田或學校自行購置等方式，不斷不斷地持續擴充學產，以試圖增益學校生員員額。¹⁰³



¹⁰³ 吳學學產在開禧二年之後，仍不斷增加。謝南〈平江府添助學田記〉，收錄於《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2，頁324下-327；〈吳學糧田續記〉，收錄於《元代石刻文獻全編》冊1，頁49-55。

第二節 吳學校務經營中所顯現的職能分流

北宋仁宗詔令天下州郡立學之前，由地方官創設的學校與私人書院之間並沒有太大區別。州級學校雖由地方長官提出申請，受到國家補助，獲賜學田但書院也同樣得到官方的認同與支持，兩者在「教本於學校，士察於鄉里」的理想上是同一的。¹⁰⁴地方官創建的學校獲得國家補助與認可，成為正式的官立學校，在宋代地方官學發展的初期，學校的經營職責主要歸屬於地方長官，教授的任務多集中在教育講學之上。¹⁰⁵知蘇州范仲淹從尋找校址、像朝廷請賜學田，到延攬教師，一手籌畫吳學的創建便可見一斑；而慶元元年，富嚴知蘇州見吳學藏書隨意擱置，日漸散脫，而欲建閣藏書，即使運用的是吳學本身的積餘經費，卻也是與吳學學址所跨吳、長洲兩縣縣令商議，而非與教授共同籌畫。

不過，由知州主導校務經營的情況，逐漸隨著教授一

¹⁰⁴ 趙鐵寒認為，當時的設學理想，是「使士皆土著」，「州縣察其履行」，「絕濫進之弊」，是自漢以來鄉舉里選之遺意。見氏著，〈宋代的州學（上）、（下）〉，《大陸雜誌》7卷10期、11期，頁15-19、頁15-17。陳雯怡在討論到宋代教育制度與理念間的互動時，也提到這點。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頁4-5。

¹⁰⁵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47，仁宗慶曆四年三月乙亥條記載，神宗熙寧變法之前教授尚取決於路級或州級長官。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47，頁3563-3565。

職的確立而出現轉變。元祐年間，朱長文(1039-1089)任吳學教授時，吳學因生員人數眾多且年久失修，而有校舍不足、傾陟褊迫的窘境。當時，教授朱長文與吳學學職同僚商議，希望能再次以南園餘地，增建學舍齋廬；然而屢屢請命，當時的知州與路級長官也都只能無奈表示，財用不足，愛莫能助。元祐四年，范純禮受命出任制置江、淮等路發運使，主管江、淮六路漕事。他藉赴任途經蘇州之便，返鄉祭祖，並赴吳學所設范文正公祠堂，祭奠父親范仲淹。朱長文便趁此機會，將學舍不足且亟待修葺一事告知范純禮。范純禮除自朱長文處獲悉吳學情況，可能也從剛由潤州調任知蘇州的王觀處得知，因生員眾多，校舍不敷使用的地方官學，不只吳學，潤州州學也有校舍殘舊的問題，而這兩學校都是早年范仲淹在外任知州時所創建的。

范純禮向宋廷上奏，代蘇、潤二學請命重修學舍，宋廷批准並撥下經費，吳學獲撥蘇州商稅的收入，以為修建資金。校舍擴建耗時一年，興築工程歷經劉瑄、王觀兩知州，其中王觀在知潤州時已有主持潤州州學重建的經驗，整個施工工程與經費運用，均得力於他的籌劃。此番整建，非但修葺了校舍，且為有助於吳學往後能永續經營，更仔細清整了原本用以供給吳學開支用度的產業，「凡學田之佃于人而隱沒者，為之括而實之；屋之僦于市而已壞者，為之新而復之；養士之資，由此不匱」。¹⁰⁶朱長文在記文中提到：

夫儒者蚤暮孜孜，從事典籍，苟居處不佚、餼糧不豐

¹⁰⁶ 朱長文，〈蘇州學記元祐五年歲次庚午秋七月甲子朔建〉，頁 4-10a。

而責其勤，難矣。故嚴其宮、足其餉，所以教也。¹⁰⁷

相較於范仲淹等人起初將地方官學配合學田制度，在全國推廣，從正面提出為國養士育才理想的經濟基礎，北宋中晚期的教授朱長文則從反面說明，校舍、食糧等經濟條件，都影響著學生的學習品質，點名了無論是校舍、資金，其苦心經營都是為了能提供生員更好的就學環境。朱長文或許不是第一個談到物質條件與學校經營二者關連的州學教授，但卻呈現出至少在北宋中晚期，即便主要的校務經營可能仍有賴地方官員的主持與支援，然而作為一名地方官學教授，朱長文已經開始意識到，關於學校的經營，不只是知識教育，也包括庶務營運。事實上，雖然朱長文在記文中大力推崇范純禮、劉垵、王觀等地方官員對吳學重建的貢獻，吳學重建之契機，仍有賴于教授朱長文的奔走。

推動此番大規模整建的吳學教授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縣人，中嘉祐四年（1059）進士乙科，後以足疾，長年侍父居鄉里。元豐、元祐年間，以道德、學術聞名遐邇，聲動京師。米芾在朱長文墓表中描述，其居蘇州時「郡守監司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必奔走樂圃，以後為恥。」¹⁰⁸朱長文居蘇州近三十年，歷任當路監司及知州累次上奏，稱其士行經術，希望能獲朝廷旌擢，差充蘇州州學教授，卻始終未果。元祐元年（1086），詔教授由原翰林學士院取試，改為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以上，擇經明、

¹⁰⁷ 朱長文，〈蘇州學記元祐五年歲次庚午秋七月甲子朔建〉，頁4-10a。

¹⁰⁸ 米芾，〈墓誌銘〉，收錄於《樂圃餘藁·附錄》，頁5a。

行修堪充內外學官者，舉二人，存記備用。¹⁰⁹該年六月，蘇軾便同孫覺、胡宗愈等人聯名上奏，請依徐積受薦，除爲楚州州學教授例，以朱長文爲蘇州州學教授。¹¹⁰當時受朝臣聯名上薦，授爲州學教授者，除徐積、朱長文外，尚有陳烈受薦爲福州州學教授，時號「三先生」。¹¹¹基本上，州學教授員額，爲有學處各州一員，但蘇州州學卻因此番舉薦，破例有了兩名。¹¹²朱長文出任吳學教授，也反映了教授一職，最初由知州或轉運司在地方上選任官員或有學術行誼的士人擔任，到熙寧年間開始由宋廷統一選任，到哲宗時期一度又改由官員推舉等波動，其實是教授一職的內涵，仍在「官職」與「地方士人領袖」間浮動的結果。

地方官學經營職能的轉變，除了教授逐漸涉入教育之外的校務經營外，也表現在地方官員對自身職任的認知。紹興年間，吳學在戰後兩次興葺，梁汝嘉和王喚身爲整建的推動者，梁汝嘉自言：「顧治民事神，皆守之職。惟是，夫子之祀，教化所基，尤宜嚴且謹，而拜跪薦祭之地，痺陋乃爾，其何以竭虔妥靈？」¹¹³王喚則說：「今（學校）蕪廢不治如此，使吏民無所瞻仰，如因陋就簡，謾不如飭，殆守土者之罪也。」¹¹⁴兩者都是以地方首長的職責出發，認爲作爲知州，有義務維繫學校教化形象，使之行禮如儀。

¹⁰⁹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70。

¹¹⁰ 蘇軾，〈薦朱長文劄子〉，《東坡全集》卷 53，頁 8。

¹¹¹ 張景修，〈墓誌銘〉，收錄於《樂圃餘藁·附錄》，頁 3。

¹¹² 張景修，〈墓誌銘〉，收錄於《樂圃餘藁·附錄》，頁 3。

¹¹³ 鄭仲熊，〈重修大成殿記〉，《吳都文粹》卷 1，頁 14b-15b。

¹¹⁴ 鄭億年，〈平江府修學記〉，《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頁 252-253。

誠然，州縣學校原本就屬於地方教化的象徵指標之一，被認為與社會風化、國家人才培育，關係密不可分，但在知識教育、風俗教化之外，維繫學校經營及供給生員生活亦是地方官學經營的一大重心，在地方官學的經營上，教授和地方長官的責任相重疊，無論是學校建築工事或教務，都可以觀察到兩方面共同參與。

然而，梁汝嘉、王喚所分別透露出的態度卻值得玩味。雖然兩者各自在其任內，表現出對地方學校的重視，因而推動地方官學整建，但同樣是對地方學校的經營，他們的出發點，卻首先著眼在學校對地方社會風化的作用。可能的原因之一，或許是因為地方官學中所要處理的事務日漸繁雜，地方學校學官又隨著官學制度完備而專職化，教授一職之職能因而由教職為主，逐漸擴大為地方官學教務、事務各方面經營的主事者。¹¹⁵原本地方守牧職責範圍中，涵蓋層面較廣泛、內容較籠統的「教化」責任，與相對具體的教育工作及其機構的經營責任，隨著地方官學出現與教授等官學主事者的專職化，逐漸分流，教育工作與州級學校經營之職責有逐漸移轉到教授等職任之上的趨勢。

對原本負有直接主持地方官學經營職責的地方官員而言，教授等學官專職化，職能範圍擴大，成為責任移轉現象的拉力。相對地，地方官員工作負擔繁重，則形成一股推力。洪邁(1123-1202)在〈御書閣記〉中曾經提到，許多知州（府）對地方事務的態度：

¹¹⁵ 朱熹，〈漳州教授廳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77（上海：上海書店，1989，四部叢刊本），頁 5a-6b。

（平江府）比比多事，且去天咫尺，南北問塗者，銜舟接軸，冗叢厥身。居東道主，第知承迎過客、趣了亭傳為先務，樸邀馬上，戴星而入，民瘼不暇問，尚安以教化勸功為哉？」¹¹⁶

樓鑰也曾提到：

吳門地大物夥，郡務又十倍于西安。舊嘗聞吳中士夫言：『吾邦使君當得三數人以治賓客、答牋書、理財賦、聽民訟，分典之乃可辦治。』雖若戲言，蓋甚言其日不暇給也。」¹¹⁷

身為地方長官，特別是主管如蘇州（平江府）這樣的繁郡，囿於各類達官使節的送往迎來，以及官司訴訟、簿書期會等繁忙事務，不是每任知州、知府都願意或是有能力，撥出額外的心力關注文教。也就是說，至少在蘇州（平江府）可以觀察到，前述分工趨勢所以出現，一方面是由於地方官學事務本身日漸繁雜，另方面也是由於地方官員事務負擔日漸繁重，因而促使地方教育與其機構的經營責任，隨著教授一職的確立、專職化，逐漸匯聚到原本主要以教務為重的教授之上。

再者，在〈平江府修學記〉石刻中，書者為通判平江

¹¹⁶ 洪邁，〈御書閣記〉，《吳郡志》卷4，頁6b-7b。

¹¹⁷ 樓鑰，〈平江府瞻儀堂畫像記〉，《攻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四部叢刊據上海涵芬樓景印武英殿聚珍本重印）卷55，頁10b。

軍府主管學事時衍之、撰者爲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提舉學事徐琛、立石者爲知平江軍府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王喚，皆是兩浙路或平江府官員，值得注意的是，三者官銜分帶「提舉學事」或「主管學事」。¹¹⁸紹興十三年(1143)起，宋廷詔令恢復宣和之前由路級、州級長貳官員帶提舉或主管學事頭銜，以稽查地方學校教育，意在督導，顯示「提振文教」與「經營地方學校」兩職能，相當程度上已經開始出現責任區隔的趨勢。¹¹⁹就吳學而言，「崇教化」仍舊屬於地方長官的職責範圍，重點在表現對地方官學教育支持與維繫，並在經費可許下，「同意」官學所提出各項有助地方教育的方案；相較之下，執行面的實際經營、籌畫，已經傾向由教授等學校主事者承擔主要工作。

在前述在倪千里清整吳學學產，利用額外收入創設吳學義廩，以及唐仁傑爲吳學添購產業二事中，也反映出教授對校務經營的能動性，相對呈現出多數時候官府對轄下地方官學的管轄上，所扮演的角色是協助者，在地方官學有需求時，視情況提供行政上的協助。就單位層級而言，平江府是吳學的上級單位，因而吳學教授作爲地方官學的主管，在制訂乃至執行決策之前，在程序上需要先向平江府請示，但實際上，平江府所做的多半是「行使同意權」，尊重地方官學所提出的校務籌畫與決策。地方官府對地方官學的「被動管轄」，給予教授等主管學校的學職人員很大的靈活空間，因此倪千里可以決定以新增租額創設吳學

¹¹⁸ 鄭億年，〈平江府修學記〉，收錄於《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2，頁252-253。

¹¹⁹ 脫脫，《宋史·高宗本紀》卷30，紹興13年8月、9月，頁559。

義廩，唐仁傑可以決定不待平江府派出其他官員代吳學購置田業，而由吳學學職人員自行選置。這些例子都顯示，即使吳學是平江府轄下的機構，但兩者之間的從屬關係，並非平江府一個命令，吳學才能有一個動作。吳學享有相當大的經營空間，擁有自己的產業，能夠財務自決，包括以學校的名義購置田業、自行擴增生員員額，以及選擇以多餘經費推動公益獎助等等，或許在這樣的情況下，平江府轄下的吳學，有些類似今日法人機構，雖然隸屬於政府單位之下，但仍保有相當程度的經營與決策的自主權，而其經營運作的中心，則是主管學校的教授。

然而，正由於地方官學經營的實際權責，逐漸由地方長官轉移到教授一職，教授雖掌有地方官學的經營權，但針對教授對地方官學的管理成效，卻沒有明確的考核機制，導致地方官學某程度上仍是「人存政在，人亡政息」。在吳學的例子中，主學的歷任教授們不是沒有意識到這點，因此無論是清整學產、創設吳學義廩的倪千里，率先提出以積餘資金轉投資的鄭姓教授或唐仁傑，其作為都是努力在任內為吳學經營創造更大的可能，並試圖促使這些可能制度化，以行之久遠，最好的例證就是倪千里所創義廩所累積的資金，最後變成唐仁傑得以擴增學產，增加生員員額的經費來源，而唐仁傑購置田產的決定，又讓吳學在往後有更多可利用的經濟資源。

第三節 教授主導校務經營的角色逐漸凸顯

在教授所經理的吳學各項事務中，最能表現其經營動能者，當屬對吳學產業的維護。需要教授出面維護吳學權益的情況，多是地方土豪侵佔、爭佃學田，詭名拒納、遲納或短納學田租，有時甚至與教育及國防之間的權衡衝突有關。從吳學的例子中，除了能觀察到教授如何履踐其職責，維護吳學權益之外，也可以觀察到隨任職者不同，所尋求的管道與手段也有差異。

紹定年間，教授汪泰亨復學田事，便展現了吳學教授在學校經濟權益維護中的主導角色與特殊手腕。¹²⁰該案從豪戶陳煥兄弟冒占學田到官司訴訟完結，歷時超過二十年，光是訴訟過程就長達十九年之久。

起初，在教授倪千里慶元二年清整府學財產前後，部分佃戶在未經吳學許可下，將吳學常熟縣約 1960.83 畝未開墾茭蕩圍墾成田。由於大部分擅自開墾的佃戶，多是為求生計，而非意在冒占學田，因此多數佃戶最後仍如實到吳學立契納租，唯獨陳煥兄弟佔了 620.76 畝的土地（約是總額的 32%），卻未至吳學立契納租。此事吳學方面本不知情，迨嘉定三年(1210)，部分佃戶向劉姓教授呈告，才使冒占情事曝光，可見並非每任教授都會特別著力於學校財務問題。在佃戶呈告後，劉姓教授便依循一般程序，數

¹²⁰ 以下案情內容，散見在〈給復學田公牒〉、〈吳學復田之記〉、〈給復學田省劄〉，不再逐一註明出處。收錄於《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頁 338 下-342、344 下-345 上、345-348。

度向平江府，乃至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申請行政協助，希望能得回田地，但都因陳煥兄弟「家豪有力」，即使更歷數任路級長官、知府與教授，此案都未有結果。

寶慶三年(1227)秋天，平江地區風雨大作，吳學主要建築幾乎全毀。¹²¹當年冬天，汪泰亨出任府學教授。¹²²或許是吳學迫切需要重建經費，因而加強了追討被侵佔產業的動機，也或許是新任教授汪泰亨本身特別有辦事手腕與魄力且急公好義，總之，吳學復田從汪泰亨上任起，開始有了轉機。¹²³紹定元年(1228)，汪泰亨備齊歷來與事件相關文件，再度代表吳學向兩浙西路提點刑獄權兼知平江府林介提出協助恢復田產的請求。

從權知平江府林介指示巡檢、縣尉追緝調查開始，審理訴訟者歷經幾度轉換。透過吳學復田的案例，也可知州

¹²¹ 范成大，《吳郡志》卷4〈學校〉，頁8。

¹²² 〈給復學田省劄〉石刻，最末有汪泰亨作六經閣落成記文，《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2，頁348。

¹²³ 目前找不到汪泰亨更詳細資料，不過紹定四年(1231)臨安大火，殿前都指揮使馮榘領軍護衛史彌遠相府，延誤救火，導致京城全毀事件，當時輿論譁然，汪泰亨上書史彌遠要求嚴懲馮榘等有關責任者人員。馮榘所為未必出自史彌遠意，但此事與宰相史彌遠關係密切而敏感，汪泰亨此舉不可不謂直言不諱。上書事見《宋史》卷423，頁12639。不過此時汪泰亨已離開吳學教授職，此外，汪泰亨同吳潛所以上書直言，也可能因為此事為懲處罪首，罪及知臨安府林介等人，而林介在兩浙西路提點刑獄權兼知平江府任上，對吳學復田事出力甚多，也可能是汪泰亨與吳潛願意犯諱直言的原因之一。

級機構審理案件，仍須透過縣級單位派員實際調查。繼任知府章良朋指派吳縣周主簿、常熟縣邵縣尉親至田地所在實查，蒐集鄰里、保正、地方父老，與當初一同圍裹蕩田者之證詞，並經主簿比對契書與田地，除證實陳煥兄弟冒占學田外，還清查出 469.75 畝無主土地。¹²⁴林介再度知平江府時，此案首度得到判定：陳煥兄弟所侵占 620.76 畝土

¹²⁴ 在這個問題上，李如鈞對寬剩的蕩田提出解釋。他引用梁庚堯的對宋元蘇州的研究，指出「蘇州地勢低窪，湖蕩散佈，塘浦縱橫，又有蕩、瀆、淹等瀦水之處，號稱『澤國』。北宋以來蘇州的發展，使得地價上漲，讓圍田變得有利可圖。於是，勢家豪戶爭相圍湖成田，擴張產權，導致蘇州耕地一步步向湖澤展拓，使許多瀦水之地變為農田。南宋晚期的官田、學田中，也有很高的比例是圍田。」李如鈞認為，本案之學田也是如此。常熟縣雙鳳鄉器字號田「先本蕩地，續後眾戶圍裹成田。濮光輔等肆名於已圍裹之後，就學立租，歲有輸納」。可知，本來是茭蕩溼地，被人私自排水，築堤圍裹，在堤內新生土地耕作，後來才向府學交租。一方面突顯出學田原本就因距離府學遙遠，難以防範他人侵犯。再者，亦可說從茭蕩（溼地）變成田地時，面積與位置不易劃分清楚，才會有多測量出四百畝地的情況。讓陳焯也得以各冒稱是開墾蕩田與「省額苗田」，據此當作興訟的藉口。李如鈞，〈從「給復學田公牘」碑刻看宋代學田爭訟〉（未刊稿）。除了李如鈞所提出的解釋之外，根據〈吳學糧田籍記〉記載，慶元二年器字號 1690 餘畝的茭蕩地即已租予王彬，當時僅有 90 畝圍裹成田，三十二年間，便擴張成 1690 餘畝，且有三分之一的土地為陳煥隱匿。如此一來，若認為多餘的四百餘畝是陳煥在二、三十年又私自開墾的土地，應也是合理的推測。

地歸還吳學，追納十年田租，同時土地上莊屋車船籍歸府學；此外，469.75 畝無主土地一併撥給吳學作為養士之用。

訴訟並未在此劃下句點。陳煥後來在安下人家染病而死，本應由其弟陳焯繳納剩餘款項，但陳焯僅繳納了 3000 餘貫便趁機脫逃，甚至謊稱冒占之學田為自己登記有案之開墾蕩田，轉向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司陳告。提舉常平公事司馬述查證後，識破陳焯妄訴，依林介原判。同時，為免日後再生爭訟，教授汪泰亨請求，透過平江府請尚書省批示，為判決結果背書，重申該田業為朝廷所賜養士學田。尚書省公文透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司，經由平江府發給吳學，為憑永久，汪泰亨便將省劄刻石為證。

復田訴訟暫告段落，汪泰亨以復田積賦 3500 餘貫文重修吳學，其間兩浙西路提點刑獄權兼知平江府林介、繼任之提點刑獄公事王與權、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公事王栻、繼任知平江府李壽朋相繼撥下經費贊助整建工程，歷時八個月完工。¹²⁵從吳潛(1196-1262)所作記文可知，吳學建築舊有屋 750 間，除了講堂、生員宿舍外，有供耆宿使用、宗室子弟學習之用、也有提供從武學或遊學平江府學者使用等不同用途。此番整建，在上述之外，汪泰亨又增建了供幼童學習的小學齋，欲更進一步完備吳學建置。吳學整葺落成，並請魏惠憲王府教授陳耆卿(1180-1236)為記，由當時權判平江府石孝隆書并題額，以資紀念。¹²⁶

¹²⁵ 吳潛，〈脩學記〉，《吳郡志》卷 4，頁 8a-9a。

¹²⁶ 陳耆卿，〈吳學復田之記〉《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頁 345。

對照《吳郡文粹》，《江蘇通志稿》在此處的抄錄應有前後錯置。

補充說明，魏惠獻王為孝宗次子趙愷，魏惠獻王府則是其後人所

孰料，紹定三年(1230)波瀾又起。陳焯隱瞞尙書省曾割下判決公文一事，謊稱冒占田產實爲自己名下省額苗田，再捏造兄長病死爲在獄身死，並聲稱官府強制追納款項是胥吏的欺詐勒索等，轉向尙書省刑部興訟。此事經鄉貢進士且任吳學學職者王天德等人向汪泰亨呈報，汪泰亨再度提出申狀，並透過平江府上呈轉運司，認爲陳焯再次詭名妄訴，或許是因爲教授汪泰亨即將離職，陳焯認爲汪泰亨卸任後，此訴訟將有翻案的可能，因此吳學備妥此前尙書省割下文書與平江府、提舉常平司判決公文，希望透過平江府上呈尙書省，割下刑部與轉運司，羈押陳焯及其子陳念九，徹底結斷其冒占學田，及違背省割命令越級妄訴情罪，並追討未納足之官府監納款項。目前沒有進一步的資料說明，整個審理過程是否順利，但此案之棘手，可能迫使教授汪泰亨採取一般訴訟程序之外的手段，直接訴諸當時最有權力的宰相史彌遠。

尙書省再度受理陳焯妄訴，可能與陳焯所捏造案情，正中宋代訴訟弊病有關。各級官員畏懼誤判將影響個人升遷考核，同時在許多案例中，訴訟過程胥吏從中奸漁，或被告冤死獄中事，時有所聞。陳焯編造的故事對審理者的說服力，再度加強了對宋代司法訴訟弊病說法的可信。關於汪泰亨上書史彌遠一事，只能從吳潛〈脩學記〉與〈給

繼承之親王府第。《宋史》卷 162 記載：「淳熙十二年（1185），詔建魏惠獻王府，置小學教授二員，以館職兼充，掌訓皇孫。既長，趨朝謁，則不以小學名，而講習如故。自後皇姪、皇孫皆置教授。」可知陳耆卿此時於專門教育皇室子孫的魏惠獻王府擔任教授。上述見《宋史》卷 162，頁 7783、頁 3827。

復學田省劄》最末，汪泰亨所作六經閣落成記文中略窺端倪。乍看之下，汪泰亨與繼任知平江府李壽朋似乎僅依程序上書尚書省，不過從吳潛提到「轉聞于相國」、汪泰亨引用生員所言「大丞相又主之於上，則此田其泰山而四維之矣」，雖然不能得知宰相史彌遠在此事上，究竟如何協助吳學，但可知吳學復田事件所以能圓滿落幕，背後可能得力於史彌遠之助。¹²⁷

面對國防需要的壓力，如何能維護學校的經濟資源，同樣凸顯了吳學教授在學校經營中的斡旋角色及手腕。

淳祐年間，吳學有兩筆隸屬田事所的田產，分別 1400 餘畝圍田及 320 畝未開墾水澤地，由地方豪戶幹人周清宋承佃。¹²⁸周清宋將水澤地圍裏成田後，卻未按時納租，原經田事所主管趙與憲(1179-1260)判定，周清宋照例應主動與吳學立契，繳納新開墾田地的田租收入。不過，由於二田地後轉隸屬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所，周清宋

¹²⁷ 汪泰亨作六經閣落成記文，見〈給復學田省劄〉最末，《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頁。吳潛，〈脩學記〉，《吳郡志》卷 4，頁 8a-9a。除了前文提到汪泰亨曾因吳學事上書史彌遠，以及紹定四年臨安大火也曾直諫史彌遠嚴懲失職者兩事外，目前無汪泰亨與史彌遠存在任何關係的資料，只知史彌遠襄助吳學復田，或許也可能與其曾任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公事，因而有地緣關係，但也或許僅是義助而已。史彌遠任兩浙路提舉常平公事，見范成大，《吳郡志》卷 7，〈官宇·提舉常平茶鹽司〉條：「史彌遠，嘉泰四年四月到任，開禧元年改除司封郎官。」，頁 18a。

¹²⁸ 張濟之，〈總所歸撥本學園租公據〉，《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頁 404。

不甘接受判決，將田租繳予吳學，便妄稱新開墾土地收入，需繳納錢糧所以充軍餉，只願繳交原租米額 120 石足，拒將新增田地租米 120 石繳給吳學。

雖然教授張濟之比對田事所舊日籍冊，確定新增田地產權應仍屬吳學，但是時對蒙戰爭方炙，亟需兵餉，迫於宋廷國防軍需吃緊的實際考量，張濟之也不便堅持田租應歸吳學。然而，到淳祐十一年(1251)，吳學生員人數已直逼 600 人，租糧收入短缺對吳學而言，意味校務將面臨營運困境。張濟之遂選擇與當時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所主管余晦協商，說明田地租米所有權，希望錢糧所能將租米撥歸吳學，而吳學也願將所得之半，輸作軍餉，以作為回復土地所有權的條件。總領錢糧所余晦回應，即使軍餉緊急，但養士是培養國脈，一不可缺，況且軍餉也不在乎區區數十石租米之有無，最後新增田租 120 石米糧，仍撥歸吳學養士。

理宗末年，對蒙戰爭日漸吃緊，吳學學田的田租也必須繳納租米以供軍需，因此若是包佃學田的地方豪戶滯納學田租糧，或是天時不合影響收成，則會連帶影響吳學繳納餉糧。¹²⁹就吳學而言，若是豐年，尚可將多餘儲糧折現，趕在納糧期限內，直接在輸納地糶米應付；若遇荒年，佃戶滯納田租，便著實成為吳學教授危機應變的一大考驗。吳學教授何林，甫於景定元年(1260)十二月上任，正因為豪戶滯納田租，便先以府學儲糧折現糶米的方法，應付吳學所需負擔的軍餉輸納。不料，隔年(1261)秋天，平江地

¹²⁹ 何林，〈蘇學復租田記〉，《吳都文粹續集》卷 3，頁 26a-28a。下文論及此事皆出此處，除引文外，不再一一註明出處。

區又遭遇大水，吳地半數以上田地均遭淹沒，而學田又多圍田茭蕩，災情更重。吳學所面臨的難題，不只是無法如期輸納軍餉，甚至連養士用度都陷入困境。教授何林與諸友商議，決定向總領錢糧所主管吳勢卿請求協助。〈蘇學復租田記〉記載，何林費時五日才完成給吳勢卿的求助信，足見其請求之慎重與忐忑，但總領錢糧所主管吳勢卿倒也立即給予了極為善意的回應——吳勢卿調度數處租米，移作軍餉，永免吳學軍餉輸納配額——既不影響軍需，也解除吳學負擔，一舉兩得。

到南宋末，軍事吃緊而兵餉日急，連一向在政策上享有較多優待的州級學校都受到擠壓，甚至必須繳納租稅以供軍需。此外，學校生員到理宗末大幅增加，學校能提供生員的待遇連帶下滑。其實何林的請求算是壓對寶，據何林友人所言，吳勢卿向來似乎也對士人與學校抱持關懷，既有能力，也願意協助府學的財務問題。事實上，吳勢卿日後正因籌措、調度軍需績效最優，晉升直文華閣學士，並提舉臨安府學事。雖然吳學此番難題，在貴人相助下順利化解，但何林在記文中，還是對學校用度日漸不敷發出名感嘆，認為雖然州縣猶有學校之設，但「食不續而員有限，毋恠乎士風之愈不古也」¹³⁰，而這樣感嘆背後所包含一名教授對地方官學經營的考量，正與北宋晚期吳學教授朱長文所言「苟居處不佚、餼糧不豐而責其勤，難矣」，如出一轍。

過去的研究較未注意到學校經營權責的轉移，隨著教授的教職官職化，加上學產制度的發展，學校逐漸類似今

¹³⁰ 何林，〈蘇學復租田記〉，《吳郡文粹續集》卷3，頁26a-28a。

日之法人，而教授則成為法人的實際經營者的現象。過去研究中所提到「教授成為地方官學的領導，主持學校事務」的描述，並不能完全反應地方官學因職權、責任轉移到教授身上，而使教授成為學校實際經營者的情況，由於較多史料得以流存至今，吳學的例子較其他地方官學更能夠明顯地觀察到這點。

然而，這樣的情況當然也會隨時勢而有所異同。如徽宗時期，宰相蔡京試圖藉興學粉飾昇平，學校制度復因新舊黨派傾軋，多次異動，如同兒戲，地方官學教授的素質良莠不齊，阿諛獻媚、穿鑿附會者所在多有，但當面臨方臘之亂時，為地方士人挺身而出的，竟是學校本身的生員；¹³¹又如江南經歷宋金戰事，非常時期官學的重建便需要仰賴地方長官的主持，這些例子都顯示出，教授對地方官學經營的能力與權責，在常態與非常態之間的浮動。

就吳學而言，從目前可見的史料中，能觀察到教授職能與國家官學政策呼應的現象。¹³²隨著州（府）學教授人選，由路級或州級長官自行選任或由幕僚兼任，到由國家統籌差遣，以考試選人或中央指派，教授一職逐漸專業化，也逐漸由原本講學為重，轉為學校事務的全方位經理者，州級長官及提舉學事官員的角色則逐漸傾向推動與督導者。這並非意味著州級長官從地方官學教育的經營中退出，而是教授專職化，且對州學事務的管理層面更為廣泛，

¹³¹ 龔明之，〈范無外〉，《中吳紀聞》卷，頁110。

¹³² 詳細的宋代國家官學政策，與教授選任制度的演變，在袁征《宋代教育》有極詳盡完整的梳理，值得參考。本文主要著眼於吳學的發展與教授職任的轉變，故不贅述。

讓州級地方官學教育及其機構經營的主要責任，從原本州級官員職能中較籠統的「教化」，分流而出，移轉到州學教授一職上。

州級學校是宋代官學教育制度中，中央太學與地方縣學之間的中介，而教授是其中主要的經營核心人物之一。宋代廣設州縣學，對教育普及有一定的貢獻，但前人研究或是集中推崇宋代書院，或是貶抑官學淪為功利角逐、生員聚食之所，對州級學校運作或教授角色等問題，未有足夠且深入的探究。透過前文的討論，至少可以在宋代吳學的經營實例中，觀察到宋代州級地方官學運作，存在這樣的趨勢——自吳學創設以來，隨著地方官學出現與教授等官學主事者專職化，州級學校實際經營的職能與責任，逐漸由初期的州級官員轉移到教授一職上。

這並非意味著州級官員從地方官學經營中退出，事實上，路級或州級地方長官仍舊與學校共同承擔了教化的責任，只是教授專職化，且對州學事務的管理更為廣泛，加上像蘇州這樣富盛的繁郡，地方官員所管轄的其他政務、事務日漸繁忙，讓州級地方官學教育及其機構經營的主要責任，從州級長官逐漸移轉到州學教授一職上，也因此開始在「推動、督導」與「實際執行」之間出現職能區隔的趨勢，使州級長官傾向由原先推動者轉為監督，而州學教授逐漸轉為經營者，對校務的經理更具有主動性，並開始負起如何使校務永續經營的實際責任。

在宋代，州學有些類似寄置地方轄下的事業單位或財團法人，對內要處理學校內部大小事，除了教學講授、例行升貢考試，同時也要處理學舍營繕、安排生員生活所需，在教學之外，經理簿書錢糧也成為一大考驗。囿於繁忙的

地方事務，不是每任知州、知府都願意或是有能力，撥出額外的心力關注文教。至少就吳學而言，雖然在碑記中首先推崇的是在任長官，但其功多在「贊成、支持」層面，有心者則進而出力協助經費問題，或是盡力解決爭訟，但絕大多數如興整、修葺、擴建等實際需要，常要靠第一線的州（府）學教授一手籌畫與請命。

本文所討論的吳學，在宋代州級學校中絕非泛例。其規模之大，至少就數字上而言，全盛時期生員直逼 600 人，校舍爲屋 750 間，學田佔地是一般州級學校的十倍以上，而且其產業面積直到南宋末當地降元之前，仍不斷增加。¹³³ 校內部門不只限於一般州學的常設形態，更有武學、小學，及專供宗室子弟就讀之所，亦設有義廩，作爲以士人爲主要獎助、救濟對象的公益事業。吳學的規模，反映了當地經濟繁盛，足以支持如此龐大而複雜的校務運作，吳學豐厚的資產，更使得任職的教授必須扮演多樣的經營者角色。朱熹(1130-1200)在〈漳州教授廳記〉中，曾提到身爲教授的重擔：

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內之纖悉，亦皆獨任之。¹³⁴

¹³³ 〈吳學糧田續記〉，收錄於《遼、金、元代石刻文獻全編》冊1，頁49-55。

¹³⁴ 朱熹，〈漳州教授廳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7，頁5a-6b。

州級學校雖是地方上的官方機構，但諸如產業糾紛、學產免稅等事宜，若不是由教授出面向地方官員提出陳請，只能延宕或不了了之。然而，教授一職本身又「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¹³⁵，因此州級學校的經營，雖歸入教授職責範疇，其興廢卻難免因人而異。吳學歷任教授，能經手主持這樣一所州級學校，無論是為維護學校權益而與地方豪互相抗，或成立平民士人社群的獎助機制，或在困頓的經濟處境下為學校尋求經費、設法周轉，以及與地方官府或其他機構交涉，在在都顯示了身任吳學教授，除了蘇州地區以及吳學形態的特殊性，促成教授在職任上所扮演角色的多樣，也顯示能妥善經理吳學校務的教授們，背後所具備的手腕與人脈。教授一職，幾經發展，其職能已不再集中在知識的傳授，更包括了教育機構的經營，莫怪朱熹會說，「教授之為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¹³⁶

¹³⁵ 朱熹，〈漳州教授廳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7，頁5a-6b。

¹³⁶ 朱熹，〈漳州教授廳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7，頁5a-6b。

第四章 新社會功能的衍生

透過吳學爲例，討論了州級地方官學的經營運作與職能分工之後，本章欲嘗試指出宋代地方官學在地方社會發展中的一種可能性與趨勢。

這種可能性與趨勢，首先要歸因於宋代士人群體的發展。由北宋到南宋，士人人數日益增長，但入仕途徑卻隨著宋朝版圖的縮小，躋身仕途者卻大爲增加而相對緊縮；士人仍舊胸懷天下，但多數時候卻只能身在地方。長期在鄉在野的現實處境，加上士人對「士」身份認同的提昇，士人逐漸成爲地方社會中別具意義的群體，主導著地方社會發展的方向與力量。同時，當科舉文化成爲宋代社會的基調之一，教育需求大增，復以宋代官方政策的推動，地方官學隨科舉文化的發展，逐漸深植於所在社會。

躋身仕途的難度提高，地方官學作爲入仕途徑的效能降低，地方官學與地方士人間的關係便開始出現了變化——地方官學非但成爲地方士人匯聚之地、地方社會文化活動的中心，更逐漸從原本以教育選才爲主要目的的機構，衍生出照顧地方士人群體的社會責任。這種照顧地方士人群體的责任，其形成緩慢而隱微，而微妙之處在於，這樣的社會責任與功能並非教授、官員、地方士人等參與地方官學經營者有意識促成，而是在地方官學的經營中，逐漸折

衡積累出的結果。

地方社會上各方帶有不同立場的人，將各自不同的考量包裝在地方官學的經營中，從創造政治氛圍、推廣個人理念、履踐志業、追求名望、乃至謀求現實利益，不一而足，其過程或帶有著歷史偶然性的累積。然而，各種不同的考量與目的所以能夠在地方官學中相互折衝，獲得實現，主要因為它們仍緊扣著地方官學設立之初所被賦予的養士取才功能。也就是說，當地方官學的經營者，將各自的不同考量與目的，加諸於經營地方官學的同時，也在不知不覺的行動中，促使地方官學原有的養士取才功能，日漸衍生出照顧地方士人的社會責任與功能。



第一節 塑造太平氛圍的政治演出

建炎四年(1130)，金兵南侵，三百年不識兵的平江府在兵馬倥傯下，幾近全毀。紹興四年(1134)，知平江府孫佑爲了轄區的戰後重建，諮訪當地與往來平江的士大夫，著手整理平江府圖籍。吳學教授孫衛受孫佑委託，協助補葺校勘從前湖州通判陳能千處得到朱長文的《吳郡圖經續記》。¹³⁷當時，吳學應逐步恢復中。

紹興七年(1137)九月，寶文閣直學士梁汝嘉(1096-1154)首次出知平江府，這時吳學已經重新課程講授與生員日常活動，但每年的春秋祭奠只能因陋就簡，以既有學舍空間克難應付。梁汝嘉在任僅十一個月便轉知台州，留下了仍舊殘缺的吳學。紹興十年(1140)六月，梁汝嘉奉命再知平江府。隔年二月上丁釋奠之後，梁汝嘉向吳學諸生說道，「夫子之祀，教化所基，尤宜嚴且謹，而跪拜薦祭之地，痺陋乃爾，其何以敬虔妥靈？」並提起紹興八年離任前，未及對祭孔祠殿善加修葺，「彌年若有所負，尙安得以罷輒自恕，復累後人乎？」爲免日後再留遺憾，便與同僚、吏員商議，以府內舊有遺材與贏餘資金，僱工整建祭祀孔子的大成殿，並修復范仲淹、胡瑗祠堂。¹³⁸

紹興十四年(1144)二月，寶文閣直學士王喚自請出知平江府。¹³⁹上任之後，王喚依照慣例赴吳學祭孔；環顧校舍，

¹³⁷ 孫佑，〈圖經續記後序〉，《吳郡文粹續集》卷1，頁21b。

¹³⁸ 鄭仲熊，〈重修大成殿記略〉，《吳郡志》卷，頁4b-5a。

¹³⁹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151，頁4a。

他嘆道：「（吳學）今蕪廢不治如此，使吏民無所瞻仰，如因陋就簡，謾不如飭，殆守土者之罪也，喚實懼焉，其敢不以敏，憚於改作？」因而在當年四月著手重修吳學，整個校舍整建工程僅耗時五個月即完工，十二月為修建工事立碑為記，除了記載整建始末，碑文還提到知府王喚在修建完成後，計畫再向宋廷請賜公田「數十百畝，以益其（吳學）用度，使餼糧常不乏，於是（吳學）就學者日益衆矣」。

140

梁汝嘉和王喚的作為，一方面表現出作為知府，對地方文教念茲在茲，但另一方面卻也反映了地方官員對中央政治風向的回應。南宋危急存亡的局勢，在經歷過宋金戰事與宋廷南渡的動盪，終於在秦檜所主導的紹興議和之後，大局抵定。在〈平江府修學記〉提到，從紹興議和以來，高宗皇帝為與民休息，遂與鄰國修好，並在臨安重建太學，頒天下州縣御筆《孝經》、《周易》、《詩》、《書》石刻，以示重視文教。¹⁴¹但是事實上，在紹興議和之前，教育文化問題並未被送高宗列入考量之內。宋廷裁撤國子監，徵用教育系統錢糧，佔用各地官學校舍。建炎三年(1129)，在戎馬倉皇之中，高宗更一舉詔令裁撤了四十三州的教授員額，直到紹興二年，才在臣下懇求下恢復。¹⁴²

紹興和議訂定之後，宋廷採取兩手策略，一面高壓打擊反議和者，一面也大力製造國內的和平氣氛，以消弭反

¹⁴⁰ 鄭億年，〈平江府修學記〉，《吳都文粹續集》卷3，頁1b。

¹⁴¹ 鄭億年，〈平江府修學記〉，《吳都文粹續集》卷3，頁1b-2a。

¹⁴²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53，頁3a。趙鐵寒，〈宋代的州學〉，頁16；袁征，《宋代教育》，頁48。

議和的聲浪，因此一改此前以文教爲輕、軍事國防爲重的政策，頒佈了一連串與恢復學校有關的詔令，試圖強調國家偃武修文的意向。¹⁴³在紹興和約簽訂的翌年(1142)二月，南宋朝廷下令重建各地受戰事破壞的州級學校。¹⁴⁴五月，又詔令各地州學均中央派任教授。¹⁴⁵《至元嘉禾志》〈海鹽縣學〉條也提到「紹興十五年(1145)，朝廷興太學，州縣學復修舉」。¹⁴⁶紹興十八年(1148)，文教重建更擴及各地縣級學校。¹⁴⁷

然而，偃武修文的政治氛圍，不可能單靠君主高宗與當權宰相秦檜二人聯手就塑造得出，更要靠秦檜背後的一群支持者共同完成。這些支持者也不能只是虛有其表的傀儡，必須既能支持高宗與秦檜大興文教的政策，又具有能力與手腕。在吳學重建的例子裡，梁汝嘉「素善秦檜」，王喚是秦檜妻舅，撰寫〈平江府修學記〉的鄭億年更是秦檜的伯叔親家，撰寫〈重修大成殿記〉的鄭仲熊亦與秦檜有私交。¹⁴⁸其中，梁汝嘉「長於吏治，在臨安風績尤著」；王

¹⁴³ 袁征，《宋代教育》，頁 48-49。

¹⁴⁴ 《宋史·高宗本紀》卷 30，紹興十二年二月丙戌，頁 555。

¹⁴⁵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45，紹興十二年五月甲辰，頁 11b。

¹⁴⁶ 徐碩，《至元嘉禾志》卷 7（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6a。

¹⁴⁷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58，頁 2b，希望於縣官中，選有出身人兼縣學教諭，提昇縣學素質。

¹⁴⁸ 脫脫，《宋史》卷 473，〈姦臣傳·秦檜〉，頁 13758；脫脫，《宋史》卷 394，〈梁汝嘉傳〉，頁 12043。陸友仁，《吳中舊事》（臺北：

喚也被指在平江府任內「凡公署、學校靡不究心」。¹⁴⁹王喚在紹興十三年(1143)知臨安府時，曾「括民間冒占白地錢，歲入十二萬緡有畸，爲太學養士之費」¹⁵⁰，因此也無怪乎在吳學重建後他能發下豪語，將向宋廷請公田數十百畝，增益吳學養士之用。

梁汝嘉與王喚兩任知府先後整葺從北宋以來有官學標的意義的吳學，其實在回應從兩次紹興議和到紹興十一年(1141)十一月宋金簽訂紹興和約後，南宋朝廷所欲塑造國家提倡文教民生的整體政治氛圍。吳學的全面重建，背後可能有秦檜在中央的奧援，相對地，這些與秦檜有私交、在外任官者，也是協助高宗、秦檜藉大興文教製造太平氛圍的助力。有學者認爲，紹興議和後一連串恢復學校教育的詔令，都是與金廷議和後，高宗與秦檜粉飾太平的手段，

藝文印書館，1966，百部叢刊函海本）卷1，頁13b。張家瑋在〈宋代蘇州府學——地方教育的實踐與困境〉（未刊稿）中，結合史料提出吳學「在紹興年間的重建，其主事者與協同者如梁汝嘉、鄭仲熊、鄭億年，皆與當朝宰相秦檜有私交。吳學能於短期內重建畢工，並獲得政府襄助，背後可能有秦檜在中央奧援」，認爲研究可應注意秦檜在南宋振興文教上的角色。關於吳學重建主事與協同者與秦檜的關係，可參見劉子健，〈秦檜的親友〉，收錄於《兩宋史研究彙編》（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143-171。

¹⁴⁹ 脫脫，《宋史》卷394，〈梁汝嘉傳〉，頁12043。丑事見《姑蘇志》卷39，頁29；此外丑對財經事務亦頗有手腕，但亦因此或聚斂之臣的評價。

¹⁵⁰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42，〈學校三〉，頁4下。

一時的高壓政策未能實質提升南宋的文教事業。¹⁵¹然而，即使是為政治服務，這些政策與作為卻也為南宋教育的發展定下了基調，重新恢復了朝廷對學校教育的支持，其結果所帶來的效益，不應因其立意而抹煞。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喚重建吳學的規劃中，提到了「廩食足」與「學」之間的關係。學校經營與生員受教外的日常需求，兩者的關連在北宋時也曾為朱長文所提出，當時他認為，如果不能提供生員良好的生活環境、不虞匱乏的日用所需，要要求生員致力於求學，是有困難的。¹⁵²吳學在南宋的重建，雖然可能是在朝廷大興文教的政治風向下趁勢而為，但王喚不僅從事地方學校的硬體建築興造，更計畫向宋廷請公田以使吳學「餼糧常不乏」的作為，卻已經超越了呼應政策的配合演出，而落實到了以關照吳學生員所需的實際考量。¹⁵³

¹⁵¹ 袁征，《宋代教育》，頁 48-49、219-220。袁征在氏著中提到，紹興議和後一連串關於文教的詔令，無論是中央或地方官學的重建，都是高宗及秦檜在與金廷議和後，把恢復學校教育當作製造和平氣氛的手段，但粉飾太平的高壓政策，反而造成官員與教員避禍怕事心理，導致中央到地方各級學校的教學與管理都很糟糕。

¹⁵² 朱長文，〈蘇州學記元祐五年歲次庚午秋七月甲子朔建〉，頁 4-10a。

¹⁵³ 鄭億年，〈平江府修學記〉，《吳都文粹續集》卷 3，頁 1b-2a。

第二節 以士人群體為中心的公益事業

紹熙四年(1193)，倪千里出任平江府學教授。到任之後，倪千里深感吳學財務狀況不足以供養生員、支持學校運作，乃重新整理吳學名下產業，希望能藉掌握吳學財務情況，設法解決經濟問題。紹熙五年(1194)到慶元二年(1196)間，倪千里透過清整受隱沒或帳務不清的學產，解決了吳學經費不足的問題。

然而，倪千里的目標不僅止於此，他認為學校「學校，義之聚，非徒養士也」，更負有教化地方風俗之責，因而計畫在吳學創設兼具獎助與公益性質的義廩。但是，這樣的計畫背後若缺乏穩定的經費支持，不過是沽名釣譽而已。因此，倪千里將此事上報當時的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黃適，黃適除撥給一頃餘的寺絕田產，也批准了倪千里代吳學提出，將蘄王府幹人郁明包佃田地收回，由吳學自行招租出佃的申請。倪千里遂以這兩筆田地每年三百五十餘石的收入，創設了「吳學義廩」。¹⁵⁴

吳學義廩的性質，有些類似今日的基金會，獨立於吳學一般收支之外，專用以支持吳學對獎助及公益事業的經營，並有固定之支用項目與規則，鉅細靡遺刊載在〈吳學義廩規約〉中。¹⁵⁵該構想雖為倪千里所發起教授，但其運

¹⁵⁴ 創設義廩，見戴溪〈吳學義廩記〉，頁24a-26b。

¹⁵⁵ 提舉常平公事以轄區內寺絕產業撥充官學所用，應是出自南宋規定。見《宋史》卷30，紹興二十一年條，「九月戊戌朔，籍寺觀絕產以贍學」，頁573。關於爭佃學田事，涉及地方豪戶侵佔學田，

作方式與義廩經費的使用，則是吳學學正、學錄等學職人員，及由平江府內官員兼領的錢糧官所共同議定。此外，由於支持義廩仍屬於公田，因此在吳學方面議定後，還經過了呈送平江府核可的程序。吳學義廩規約呈送平江府後，得到知府王漑及府內幕僚的支持，並在慶元二年與吳學財產同立石刻後施行。¹⁵⁶〈吳學義廩記〉大略描述了義廩經費的運用：

歲取其入，祠祀范文正公，及教養其遺三人。士有入太學，與薦名登科第者，助其費有差，文、武士、宗子皆預焉。止至會拜、春秋釋奠，其與行禮者，凡費于此乎取。又將斥其餘，以助士貧而親不能葬，與嬰孩之遺棄者。¹⁵⁷

主要可分為紀念范仲淹、獎助、吳學公共活動，及救濟等四個方面。所謂公共活動，包括春秋釋奠或祭祀先賢、在吳學內所舉行的敬老或尊賢儀式、延請鄉曲宿儒所需發給的津貼與接待費用。獎助方面，包括對文武舉士人參加省試或入太學的補助，以及中舉獎勵與慶賀筵席的開支等；其中，對士子的補助與獎勵，則隨在學聽讀年限、考試成

後詳。〈吳學義廩記〉言此田地可得租米 350 石餘，但〈吳學糧田籍記〉將詳細數字列出，為目前所引之 378 碩 3 斗 3 升 5 合。見〈吳學糧田籍記〉，《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 2，頁 287-288。

¹⁵⁶ 〈吳學義廩規約〉、〈吳學糧田籍記〉、〈吳學義廩記〉都是在慶元二年正月所作。

¹⁵⁷ 戴溪，〈吳學義廩記〉，頁 24a-26b。

績，及考試項目，各有不同。吳學義廩也針對貧士親長的喪葬，與被棄嬰孩，設有救濟經費。此外，吳學義廩經費的運用，並非在慶元二年立石之後就一成不變，從〈吳學義廩規約〉石刻中，所插入一段紹定元年到六年(1228-1233)的刻文，可知在日後吳學義廩對鄉賢的祭祀，或是吳學義廩田地的擴充與轉撥他用，仍在繼續調整。¹⁵⁸

需要特別一提的「祠祀范文正公，及教養其遺三人」一事。吳學乃范仲淹所親創，為感念對吳學及蘇州的貢獻，對范仲淹的祠祀格外重視也頗為合理，問題在「教養其遺」。范氏後人的調贍與子弟求學，原可仰賴范氏義莊的收入，然而范氏義莊「南渡之後，雖田畝僅存，而莊宅焚毀，寄廩墳寺，遷寓民舍，蠹弊百出，盡失初意」。¹⁵⁹范氏義莊營運出現窒礙，更遑論維繫義學及後人的教養，因此在吳學義廩設立之時，乃在祠祀之外，另設經費贊助范氏後人的教育。吳學此舉既是對范仲淹的紀念推崇，亦是不忍見

¹⁵⁸ 倪千里，〈吳學義廩規約〉，《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2，頁342-344。

由於《宋代石刻文獻全編》中所錄〈吳學義廩規約〉碑文殘缺，目前只存士人赴省試或入太學等項目的詳細內容，其他內容則據〈吳學義廩記〉所提概要而來。此外，關於士人親老喪葬的補助，與地方官學、士人之間的關係，比較容易理解；然而關於被棄養的嬰兒的安置問題，較令人有疑義。不過，湖州的例子可以提供參考。袁甫至湖州任通判時，湖州官學亦設有嬰兒局。嬰兒局之附設於州學，乃因此議首為州學教授之請。袁甫，〈湖州嬰兒局增田記〉，《蒙齋集》卷12，頁1-2。

¹⁵⁹ 范之柔，〈續定規矩〉，收錄於《范文正公集·附錄·義莊規矩》，頁7b。

先賢之後家道衰微所做的贊助與救濟，正是倪千里所謂的「事關風教，非學校誰實主之」。吳學作為官方機構，義廩規約經過吳學學職者共同商議，並呈平江府核可後實行，說明地方官府也贊同這樣的作法，且由吳學窗口負擔起賙濟先賢後人的責任。¹⁶⁰

倪千里創設吳學義廩的想法，可能受到鄉曲義莊或范氏義莊等地區性或家族性的公益事業的啟發。¹⁶¹倪千里發起吳學義廩之初，曾說道：「學校，義之聚也，非徒養士也。」所謂「義之聚」，所指可謂是一種非血緣的團體聚合，明確地說就是業緣關係。¹⁶²過去，范仲淹創范氏義莊所要幫助的，是以血緣為主體的范氏宗族；南宋的鄉曲義莊，則是以地緣為中心，組成自發性的社會互助組織；而吳學義廩可能借用了類似的概念，以「士」的業緣身份，比擬地緣或血緣，希望能提供給當地士人更多的幫助。

起初，地方官學制度設置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希望透過官學養士，提供生員無虞日常所需的就學環境，並在教養的同時考察士人德行，藉以拔擢德藝兼備者，為國家所用。官學養士成為定制後，卻因缺乏在學就讀年月限制等配套措施，常有生員在官學掛籍但未到學就讀，僅空領津貼等問題。到南宋，官學養士政策的弊病亦發嚴重，葉

¹⁶⁰ 戴溪，〈吳學義廩記〉，《吳都文粹續集》卷3，頁24b-25a。

¹⁶¹ 倪千里〈吳學義廩規約〉，《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冊2，頁342下。

曾在平江府學就讀的黃由，為吳學義廩規約石刻題文時，談到這點。

¹⁶² 關於士人的同業意識與關懷，黃寬重在〈兩宋政策與士風的變化〉一文中，曾對此加以說明。

適便曾提出批評：「今州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但即便設備、師資一流，卻因為缺乏考察之法，不講學問，「徒以聚食，而士之負俊氣者，不願於學矣」。¹⁶³然而，換個角度，地方官學淪為聚食之所一事，點出南宋大量的地方士人，因「士」的身份，形成了某種良莠相雜，有別於以血緣、親屬關係而相類聚的基層社會群體。

當士人的群體意識，逐漸隨著科學社會發展的成熟，與士人群體的擴大，逐漸萌芽，而地方官學作為地方上匯聚士人的主要場域與機構，地方官學主事者也開始意識到這樣的發展，而將關注焦點置於士人群體之上。尤其，士人作為風教的表率，養士的目的，不僅僅是在「養」而已，學校有不可旁貸的社會責任；反過來說，當學校提供了士人足夠的照顧，士人也才能在衣食足之後知榮辱。

地方官學長期根植於地方社會，作為地方士人匯聚之地、地方社會文化活動的中心，雖然因為士人群體不斷增加，原有的教育功能開始供不應求或是成效不彰，而需轉賴私人講學機構的輔助，但地方官學卻也在教育之外，逐漸衍生出照顧地方士人群體的社會責任與功能；若是行有餘力，則由士人群體向地方社會的其他成員擴展。¹⁶⁴吳學在慶元年間所創設的吳學義廩，獎助對象不限於就讀於吳學者，也擴及於平江府轄下五縣的士人，正是以當地以士

¹⁶³ 葉適，〈奏議·學校〉，《水心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烏程劉氏藏明正統本影印）卷3，頁22b。

¹⁶⁴ 戴溪，〈吳學義廩記〉，《吳都文粹續集》卷3，頁24a。

人社群爲主要對象的公益事業，即使未曾入州、縣學等官學就讀者，也給予相當的福利與補助，進而擴及貧窮士人之親長，及被遺棄的嬰孩。



第三節 官員理想與地方士人利益間的折衝

嘉熙元年(1237)，王遂受命知平江軍府事兼節制許浦顧涇水軍。¹⁶⁵王遂初至平江，便赴吳學會見諸生員，且以平江府「六君子」——范仲淹、胡瑗、朱長文、王蘋、尹焞、陳長方——行誼事蹟爲策題，試驗諸生。¹⁶⁶王遂在策題中寫到：

豈必鄉之先生而後敬之？仕於其邦、寓於其里者，皆所當然也。師道立，善人多，豈不宜乎。若文正范公生於斯、仕於斯，樂圃朱公、唯室兄弟皆長於斯、私淑艾於斯，若安定胡公教授是邦，和靖尹公講道虎邱之下，著作王公召於吳而老於吳，是六君子者，雖事顯晦之不同，非吳之所謂先師歟？非吳學之士所當嚴事而景行者歟？¹⁶⁷

¹⁶⁵ 關於王遂任平江知府事，據《王著作集》所收錄王遂所作立祠祭文，自言「維嘉熙元年，歲在丁酉八月己卯朔初八日丙戌，朝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平江府兼節制許浦顧涇水軍王遂，謹以清酌庶饈之奠，致告於著作先生王公、唯室先生陳公」，則《吳郡志》、《姑蘇志》所載王遂在任時間有誤。王遂，〈實齋王先生立祠祭文〉，《王著作集》卷6，頁2b。又據王德文所上〈立祠劄子〉，則王遂知平江府又可前推至嘉熙元年七月之前。王德文，〈立祠劄子〉，《王著作集》卷6，頁。

¹⁶⁶ 〈掌祠府帖〉，《王著作集》卷6，頁5b。

¹⁶⁷ 王遂，〈嘉熙元年詔舉策題〉，《王著作集》卷5，頁13b-14a。

王遂指出，士人之學，不當僅就狹義的教師學習知識，身爲一地士人，更當詳知曾仕於斯、居於斯諸賢之行誼事蹟，乃至德行學問，進而以其人爲師法。這王遂的定義下，鄉賢的範圍更爲擴大。

被王遂所挑選的「六君子」中，王蘋爲二程門人，被譽爲閩中理學之傳。¹⁶⁸尹焞同樣受學二程，靖康之難南渡之後，在蘇州虎邱山講學。陳長方則爲王蘋的著名弟子。朱長文在《宋元學案》中，被列爲「泰山門人」、「伊川學侶」，其與二程交好，青年就讀於太學時，曾受學於胡瑗、孫復，長文父亦與兩人爲世交。胡瑗在宋代學術的發展譜系中，被與孫復、石介並論爲「宋初三先生」，三人都受知於范仲淹。至於范仲淹，到南宋被士人譽爲「本朝第一流人物」，大儒朱熹甚至傾向把道學開端，向范仲淹推展。¹⁶⁹

¹⁶⁸ 王蘋所以在蘇州地區受到推崇，乃至在王遂任知州時，入祠於吳學，部分源自其曾從學於二程的學術背景。楊時作為同學於程門的先進，便曾讚譽道：「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王蘋之字）。」

¹⁶⁸ 王蘋在南宋初獲高宗召見，面諫三事，破格升遷，另一項重要原因。紹興四年，高宗駐蹕平江，權發遣平江府孫佑舉薦其學行，王蘋以布衣獲上殿對奏「治本三說」——正心誠意、辨君子小人、消朋黨——並因此獲賜進士出身，授著作佐郎。高宗此舉，在大局稍定之後，當然頗有籠絡士人，並表現政權正統性的意味，但王蘋受召也可佐證其在蘇州地區之重要地位。

¹⁶⁹ 這點余英時在《朱熹的歷史世界》中，首先舉了《朱文正公集》及《朱子語類》中，朱熹的看法，其次以四部叢刊中《范文正公集》末所附的〈諸賢讚頌論疏〉，說明以范仲淹為宋代士大夫典範，

王遂的一道策題，非但點出了士人進德修業與地方社會之間、蘇州地區「六君子」與吳地之間的聯繫，將士人、學習與在地社會緊緊繫在一起，更串起了「六君子」在理學譜系中的位置，串起了吳地與理學的淵源。

揀選出所謂「六君子」的王遂，其實是朱熹再傳弟子，受學於黃榦，亦與真德秀交好；後者被譽為繼朱熹之後，最傑出的理學領袖。¹⁷⁰自理宗端平親政，不少理學士人重受擢用，一時號稱「小元祐」，王遂亦在其列，且常居內外要職。¹⁷¹據《姑蘇志》記載，王遂「差知平江，……遂至郡，即以崇學校、寬民力、抑豪強、正風俗為務。會兩倅、六縣令，賦詩勉勵。時詣學，為諸生講說，吳中理學愈盛。」

¹⁷²

王遂與吳學生員此番初會，藉策題談到「六君子」行誼事蹟，並在策題最末，以朱熹起于諸賢之後，詢問諸生其學問之意涵，並要求生員闡述「六君子」之學術行誼，

並非朱熹一人私見。參見氏著，《朱熹的歷史世界》（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03），頁 288。關於范仲淹與宋代道統間的關係，另可參考劉子健，〈宋末所謂道統的成立〉，《兩宋史研究彙編》收錄於《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 256-257。

¹⁷⁰ 王遂，〈參政文忠真公祠堂記〉，《景定建康志》（收錄於《宋元方志叢刊》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 31〈儒學志〉，頁 1861。

¹⁷¹ 脫脫，《宋史》卷 414〈鄭清之傳〉，頁 12420；卷 415〈王遂傳〉，頁 12461-12462。

¹⁷² 王鏊，《（正德）姑蘇志》卷 40〈宦績·王遂〉，頁 8a。

與朱熹異同之處，表現出他對地方教育與對理學理念推展的關注。除此之外，他也在論及王蘋與陳長方的學術行誼時，特別對「二公（王蘋、陳長方）亦中興以來之端人也，而郡不知尊，學不知祀」提出質疑，可見王蘋、陳長方事蹟在當時仍為地方所知，但在王遂上任之前，二人並未受祠於學。¹⁷³

關於王遂對地方先賢祠祀的重視，劉子健曾指出，朱熹的學派倡導建祠紀念先哲先賢，無論是本籍，或在當地有宦歷或講學事蹟者，只要學問德行值得尊敬，皆立祠崇祀，試圖利用地方鄉賢行誼的感召，以達成警惕督促士子學習的心理效果。¹⁷⁴Neskar 則受到 Hymes 的啟發，進一步提出南宋鄉賢祠的設置，與地方意識興起之間，有著密切的關連。¹⁷⁵此外，關於對地方先賢的祠祀推崇，也有學者提出此舉象徵了地方意識的凝聚，有標舉鄉里特色，形塑本土文化的用心。¹⁷⁶同時，表現出士人心中，除了國家思想文化傳統，更開始關注所在周遭人物、風土、事件等，具地方特色的思想文化產物，開始在「同」之中，重新發

¹⁷³ 王遂，〈嘉熙元年詔舉策題〉，《王著作集》卷 5，頁 16a。

¹⁷⁴ 劉子健，〈宋末所謂道統的成立〉，《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1987），頁 264-265。

¹⁷⁵ Ellen G. Neskar, *The cult of worthies :A study of shrines honoring local Confucian worthies in the Sung Dynasty (960-1279)*, Thesis (Ph. D.), Thesis (Ph. D.) Berkeley :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reface vi.

¹⁷⁶ 黃寬重，〈兩宋政策與士風的變化〉

現「異」，發現自身特質。¹⁷⁷王遂秉持著自身的學術理念與價值觀，推動地方文教，因而提出了「六君子」之論，希望將士人進德修業與地方社會聯繫在一起，以更貼近在地社會的鄉賢行誼，作為使當地士人見賢思齊的感召。王遂的呼籲很快就得到了回應，但回應背後的考量可能不如王遂所預期的那樣充滿理想。

王遂透過策題，表達自己對地方文教的關心。不久之後，當年七月，王蘋曾姪孫王德文便順勢向平江府呈上劄子，提出希望曾祖父王蘋能入祠吳學的請求。王德文在劄中略述王蘋的行誼事蹟，既感念守令能重視明義理之學者，也愧於身為王蘋後人卻未能克紹箕裘，光耀門楣，但最要緊的而實際的理由，可能還是劄中所提：「近日唯室先生許祠於學……唯室，師曾大父者也，且蒙崇獎，則為師者，當俾與唯室並祠，何榮如之然？」¹⁷⁸王蘋後人求的是榮譽，王蘋弟子陳長方既以入祠，王蘋更當比照辦理。王遂以「王著作乃程門高第，他郡猶為之立祠，況生長之郡乎」為由，判可此事，送下吳學議行，並在八月，正式舉行祭儀，將王蘋與陳長方同祔學祠。¹⁷⁹

山口智哉曾以王蘋後人的宦歷與境遇，對此事提出分析，認為王德文在〈立祠劄子〉中所提家道衰落之說，頗堪玩味。王德文本人雖未能透過以科舉入仕，但仍在泰州海陵縣令趙善湘的進用下，以修築城壁有功獲得官銜，此

¹⁷⁷ 包弼德著，吳松弟譯，〈地方史的興起——宋元婺州的歷史、地理和文化〉，《歷史研究》第21輯(2006)，頁432-452。

¹⁷⁸ 王德文，〈立祠劄子〉，《王著作集》卷6，頁2a。

¹⁷⁹ 王遂，〈實齋王先生立祠祭文〉，《王著作集》卷6，頁2b-3a。

後分別在王遂、史宅之、陳垓及鄭宗山等地方官員幕下任職。¹⁸⁰王德文兄長文斗文雖然以相較於進士甲科略遜的乙科入仕，但卻也曾擔任池陽倉曹、金陵酒庫、當塗差遣及淮西總幕。¹⁸¹山口智哉認為，雖然王蘋後人必然不是過著優渥生活的官僚家族，但仍得以藉士大夫與士人的交流活動中獲得官職，持續維持士大夫家族的身份。王氏後人對王蘋入祠的積極，乃源於自覺與先人在地方社會，乃至整體南宋的活躍相較，家族的發展有沒落的趨勢，此時若能讓家族先人祔祠於地方士人高度集中的地方官學之內，對王氏後人來說，有維繫王氏家族在平江地區社會地位的意義。¹⁸²

王蘋後人配合知府王遂推動鄉賢祔祠官學，不只涉及家族在地方社會的聲譽，亦關係著自身的實質利益。王蘋入祠吳學九年之後（淳祐六年，1246），就讀於吳學時中齋的生員王思文——王德文的從兄弟——再度向平江府呈狀，希望能夠以奉祠之名，領取津貼。事情原委，始自王蘋門人陳長方後人陳之諒，早先曾向前任判知平江府史宅之提出請求，得到了吳學中管理陳長方祠祀的職位，每月還可領奉祠津貼，而且「其他先賢之後，亦各有之，獨是曾大父（王蘋）之祠缺然有愧」。王思文委婉但故作姿態地表示，之前曾獲前任吳學教授所給補貼，以祭祀先人，雖

¹⁸⁰ 王杲，〈宋故提幹王公壙記〉，《吳都文粹續集》卷 40，頁 21a。

¹⁸¹ 王庚孫，〈宋鎮東將僉判王公墓志〉，《吳都文粹續集》卷 38，頁 23a。

¹⁸² 山口智哉，〈宋代先賢祠考〉，《大阪市立大學東洋史論叢》15 號（2006.11），頁 102-103。

以滿足且不敢躁求，然而「著作（王蘋）門人之後既已得職，儻不控陳，實維暴棄」言下之意，爭取的還是正式職任和俸祿。¹⁸³

這項申請從王思文在淳祐三年(1243)提出，到平江府核可發下施行，耗費近三年。過程由王思文提出申狀，經府方發下公使庫查證吳學掌祠官俸祿，同時要求王思文出示掌祠帖證明，並調查掌祠俸祿是否有等級高下之別。雖然王思文並無掌祠帖，但府方承辦幕僚傾向比照陳長方後人掌祠例，由府方向吳學求證，並由擔任學職的生員許東發替王思文申狀作證其掌祠事實後，經平江府核可，同意王思文從淳祐六年(1246)六月起支領俸祿，並補發掌祠帖。¹⁸⁴

對此，山口智哉也分析到，王氏後人對先人入祠的態度，除了維繫與提升家族在地方上的社會聲望之外，有時也抱持著來自官方實質經濟援助的期待；而對地方官員來說，接受地方鄉賢附祠地方官學的作法，也是一種對鄉賢

¹⁸³ 〈掌祠府帖〉，《王著作集》卷6，頁5-7

¹⁸⁴ 〈掌祠府帖〉，《王著作集》卷6，頁5-7。王思文爭取奉祠津貼事，山口智哉在〈宋代先賢祠考〉已有詳盡分析，遂不贅論。山口智哉，〈宋代先賢祠考〉，《東洋史論叢》第15號(2006.11)，頁89-111。王思文爭取奉祠津貼事，在十年後（寶祐四年，1256），王思文將於吳學重刊福清縣所藏墨本《王著作集》，委託盧鉞作序時，被美化描述為「曩王公遂守此邦，始祠先生於學，訪其後曰思文者，俾奉嘗歲時。」完全被改寫為賢守重視地方文教，推崇先賢，並訪求後人以祠祀的理想圖像。盧鉞，〈序〉，《王著作集》卷首，頁3a。

後人的援助策略。其實，遠藤隆俊在其研究中，也曾提出類似的看法。他以知平江府潛說友於咸淳十年(1274)，在既有的吳學范文正公祠之外，於平江府城內另立范文正公祠，並置田三百畝為營運費用，並交託范氏後裔管理一事為例，說明無論是在地方官學之內或之外，先賢祠的設立其實是官府對地方社會中官僚家族後裔的支援與救濟。¹⁸⁵但潛說友新建范文正公祠，在祠堂落成啓用時，也曾在其中對平江士人講授，就此意義而言，在學校之外新建的祠堂，相當程度也意味著學校的擴大。

地方鄉賢入祠地方官學，既是地方士人家族拉抬社會聲望的方式，也是地方官府對鄉賢後人的援助策略。在過程中，學校是兩者之間的折衝，地方官府希望透過鄉賢祠的設置，推動地方的教育文化，有甚者，地方官員本身也可能藉鄉賢祠的設置，履踐個人的學術理念與價值觀；對地方鄉賢的後人而言，入祠地方官學，則既有助提升家族在地方社會的地位與聲望，更可能藉此獲得實質的利益。二者的期待，因著地方官學所被賦予的文教中心地位，而在鄉賢入祠地方官學的過程中，同時得到落實。

上述所舉諸例，反映出地方官學的經營，包含著地方社會上不同立場者，各自不同的考量，從創造政治氛圍、推廣個人理念、履踐志業、追求名望、乃至謀求現實利益，不一而足。這些目的與考量，其初衷不見得皆以照顧地方社會士人群體之需要為出發，但其行動上，卻選擇了以增

¹⁸⁵ 遠藤隆俊，〈宋代蘇州の范文正公祠について〉，《柳田節子先生古稀記念中國傳統社會と家族》（東京：汲古書院，1993），頁329-346。

益學校生員乃至地方士人的利益來呈現，促使地方官學原有的養士取才功能，日漸生長出照顧地方士人的社會責任與功能。照顧地方士人群體的責任，緊扣著地方官學設立之初所被賦予的養士取才功能而生，其過程或帶有著歷史偶然性的累積，甚至連當事者也未必意識到未來可能造成的歷史結果。地方官學及其主事者，所自覺到的責任，是以學校生員為中心，擴及地方社會整體士人群體；然而限於能力，帶有風教象徵的地方鄉賢及其後人，往往成為照顧救濟的優先考量對象。



第五章 結論

宋代的蘇州，是個人文薈萃的文化城；但若仔細思考，由於其政治、經濟上的特殊性，就一個文化城市而言，毋寧說蘇州是個藝文城，而很難說它是個學術城。宋代蘇州文化繁夥的景象，往往來自士人們的交遊酬唱，而非遍地開花的教育活動。吳學自景祐二年范仲淹創建以來，始終是蘇州地區最主要的教育機構與中心，並因其官方性質，透過祭孔、鄉飲酒禮等儀典的舉行，或是作為宣告政令之所，成為地方社會活動的重要場域。吳學自范仲淹創建起，即便歷經天災、戰火與歲月的侵剝，仍歷經宋、元而不墜，並延續到明、清；甚至當南宋時期，理學興起，不少地區以復興或後起的書院，取代了地方官學成為當地主要的文教重鎮時，吳學在蘇州地區仍保有其重要地位。

除卻在地方上的重要意義，與宋代的其他地方官學相較，吳學亦有其特殊性。一所地方官學的維繫，至少有三個背景性的理由：科舉制度、官學養士政策與學官制度；不過，即使有這三個條件，並不保證地方官學能永續經營。從吳學的發展歷程來看，最明顯的特色就是其延續不墜，而其所以延續不墜，一則來自蘇州地區特殊的社會文化與政治、經濟條件，另則來自包括地方官員、官學教授及地方士人等參與者的共同經營。

在吳學的經營與發展中，教授的角色逐漸凸顯，其職能由原先以教學爲主的教職，逐漸擴大爲地方官學事務的全方位經營者。吳學規模之大，全盛時期生員直逼 600 人，校舍爲屋 750 間，學田佔地是一般州級學校的十倍以上，而且其產業面積直到南宋末當地降元之前，仍不斷增加。校內部門不只限於一般州學的常設形態，更有武學、小學，及專供宗室子弟就讀之所，亦設有義廩，作爲以士人爲主要獎助、救濟對象的公益事業。教授對內要處理學校內部大小事，除了教學講授、例行升貢考試，同時也要處理學舍營繕、安排生員生活所需，在教學之外，經理簿書錢糧也成爲一大考驗。

吳學的規模，反映了當地經濟繁盛，足以支持如此龐大而複雜的校務運作，吳學豐厚的資產，更使得任職的教授必須扮演多樣的經營者角色。吳學歷任教授，無論是如汪泰亨爲維護學校權益而與地方豪互相抗，或倪千里建立扶持士人社群的公益救濟獎助機制，或是張濟之、何林在困頓的經濟處境下，與地方官府或其他機構交涉，爲學校尋求經費、設法周轉，這些例子在在都顯示了身任吳學教授，除了蘇州地區及吳學形態的特殊性，促成教授在職任上所扮演角色的多樣，也顯示能妥善經理吳學校務的教授們，背後所具備的手腕與人脈。

然而，教授一職對地方官學的經營上又缺乏考核機制，因此州級學校的經營，雖歸入教授職責範疇，其興廢仍難免因人而異。在吳學的例子中，卻也看到了盡心經營地方官學的教授，確實嘗試將個人所爲制度化，以求永續。在吳學的例子中，教授一職，幾經發展，其職能已不再集中在知識的傳授，更包括了教育機構本身的經營。

吳學的例子，除了體現教授一職在地方官學的經營中，角色逐漸凸顯，也反映著地方官學在所處社會中，所具有的可能性與發展趨勢。這種可能性與趨勢，首先要歸因於宋代士人群體逐漸發展，成為主導地方社會的重要力量；其次，也因科舉文化成為宋代社會的基調之一，教育需求大增，復以宋代官方政策的推動，地方官學隨科舉文化的發展，逐漸深植於所在社會。當兩者在地方交會，地方官學成為國家力量在地方上，除了地方官府之外，面對地方士人的另一個窗口。雖然士人透過學校流向官僚系統的可能性降低，但學校在地方上照顧地方士人的責任卻逐漸加強。地方官學非但成為地方士人匯聚之地、地方社會文化活動的中心，更逐漸從原本以教育選才為主要目的的角色，衍生出照顧地方士人群體的社會責任。

地方官學也因此顯得有些類似現代的法人組織，他隸屬於地方官府轄下，但多數事務自理，地方官府扮演的是提供協助的輔助角色；其功能的發揮，首先以地方士人群體為主要對象；行有餘力，則擴及地方社會的其他成員。這種照顧地方士人群體的責任，其形成緩慢而隱微，而微妙之處在於，這樣的社會責任與功能並非教授、官員、地方士人等參與吳學經營者有意識促成，而是各種不同的考量被包裝在地方官學的經營中，從創造政治氛圍、推廣個人理念、履踐志業、追求名望、乃至謀求現實利益，不一而足的。這些目標與考量，在地方官學中彼此相互折衝，共同獲得實現，進而促成吳學「照顧地方士人的社會責任」之實現。在層層累積的過程中，並非每個時期的每個參與者，都意識到自己的作為，會積累出這樣的結果，誠如王、梁汝嘉，配合政治演出的意味，可能更勝於興學養士

的理想。即使如創設吳學義廩的倪千里，應該也並未預見到，自己的作為會成為一股細流，在日後匯聚成地方官學照顧地方士人的社會責任。

從地方官員、教授及士人共同經營吳學的例子推而廣之，其實有助研究者思考過去對地方官學制度的討論。過去討論地方官學的學官制度，一般多將焦點集中在教授的專職化，及提舉學事司的出現，也就是單純就各類學官的出現、職能內容分別討論。如果從地方官學的經營入手，就會注意到過去在學官研究中，未曾注意到地方官學的經營，是由單線朝雙線發展的，而且涉及社會的諸多層面，這正是本文所著力之處。

官學設立之初，許多學校由當地地方長官所請建，從尋找財源、延攬教師到安頓生員、主持校園興葺等，多由地方長官直接管理。從熙寧年間，州學教授開始必須經由考試始能選任後，地方官學教授一職便日益專職化，並且其職任不僅限於從事教學工作，也必須承擔起主持學校各種事務的責任。由於地方官學事務日漸繁雜，知州等地方官員本身事務負擔也日漸繁重，因而促使地方教育與其機構的經營權責，隨著地方官學教授此一職任的確立與專職化，逐漸匯聚到原本主要以教務為重的教授之上。知州等地方長官其職責雖然仍總括轄區內所有的地方事務，但對地方官學的經營已不再完全事必躬親，在一般情況下，僅負擔著推動教化的監督責任，而教授則轉為學校事務的全方位經理人。

北宋哲宗時，各路轉運司也涉入了地方官學的經營之中，但偏向財務管理的部分。北宋末，提舉學事司創設，地方官學經營分流的情況就更為明顯——提舉學事司、轉

運司等路級監司，以及州縣長官總領性地監督推動轄下文教事業的進行，教授則實際負責校內事務管理。教授對學校的經營，是其職任中的專一性內容；州縣官員乃至路及提舉學事司對轄內學校事務之參與，是來自其對轄下事務的總體性含括。因此，當教授一職出現，地方官學的事務與職責，自然向官學教授集中。地方官學教育及其機構經營的主要責任，開始在「推動、督導」與「實際執行」間出現職能區隔，比較模糊的是州縣長官並未完全從實際的校內事務中退出，有時隨著州縣長官個人的意向，或外在因素的改變，如國家情勢的變化，地方長官也可能從推動監督者，再轉回涉入實際事務的經營。

以吳學為例，研究州級地方官學的經營，地方官學與地方社會間互動的可能性，既有其具有普遍性的一面，亦有其特殊性。透過吳學的個案研究，要捕捉的是，在宋代國家情勢、教育文化政策等類似的條件背景下，作為地方官學，在地方上可能有怎樣的發展趨勢。在這樣的出發點之下，蘇州地區的例子絕對不會和其他地區背道而馳或獨立存在。只是蘇州地區政治、經濟的特殊性，自然使吳學在諸多實際而具體的細節上，有無法廣泛解釋宋代其他地區地方官學發展運作情形的疑慮，實際上也正是如此。然而，本文的目標，卻也僅止於說明當歷史發展的諸多條件，匯聚到宋代蘇州此一時地時，地方官學與地方社會之間，會激盪出什麼樣的可能性，人在其中實際的活動情況又是如何而已。

引用書目

一、古典文獻

1. 不著撰人，《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2.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四部叢刊本，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明刊本影印。
3. 王鏊等撰，《（正德）姑蘇志》，收入《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明正德刻本。
4. 王蘋，《王著作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5. 北京國家圖書館編，《宋代石刻文獻全編》，北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3。
6. 北京國家圖書館編，《遼、金、元代石刻文獻全編》，北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3。
7. 司馬光，《傳家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8. 司馬光，《溫國文正司馬公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據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常熟瞿氏藏宋紹興本影印。
9. 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10. 朱長文，《樂圃餘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11.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上海：上海書店，1989，四部叢刊本。
12.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13.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
14. 沈括，《長興集》上海：上海書店，1936，四部叢刊本，據上海涵芬樓借印浙江省立圖書館藏明覆宋本影印。
15. 汪應辰，《汪文定公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1997，四庫存目叢書據明嘉靖二十五年夏浚刻本。
16. 周必大，《文忠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17.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四部叢刊本，據江南圖書館藏明翻元刊本影印。
18. 范成大著、汪泰亨等補編，《吳郡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宋紹熙三年(1192)修，紹定二年(1229)續修，據民國十五年(1926)吳興張氏擇是居叢書景宋刻本。
19. 徐碩，《至元嘉禾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20. 袁甫，《蒙齋集》，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據武英殿聚珍版排印。
21. 袁燮，《絜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22. 馬光祖，《景定建康志》，收錄於《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
23. 馬端臨，《文獻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24. 梁克家修，《淳熙三山志》，收錄於《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
25. 陸友仁，《吳中舊事》，收入《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26. 葉適，《水心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據上海商務

印書館縮印烏程劉氏藏明正統本影印。

27. 趙弘恩等監修、黃之雋等編纂，《江南通志》，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28. 趙抃，《清獻集》，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29. 樓鑰，《攻媿集》，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四部叢刊據上海涵芬樓景印武英殿聚珍本重印。
30. 樓鑰，《范文正公年譜》，收入《范文正公集》，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四部叢刊本，據江南圖書館藏明翻元刊本影印。
31. 鄭虎臣，《吳都文粹》，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32. 鄭興裔，《鄭忠肅奏議遺集》，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33. 盧熊等撰，《（洪武）蘇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明洪武十二年(1397)鈔本。
34. 錢穀，《吳都文粹續編》，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35. 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上海：上海書店，1989，四部叢刊據上海涵芬樓景印烏程劉氏嘉業堂藏宋刊本重印。
36. 魏泰，《東軒筆錄》，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37. 蘇舜欽，《蘇學士文集》，上海：上海書店，1989，據上海涵芬樓景印清康熙刊本重印。
38. 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39. 龔明之，《中吳紀聞》，孫菊園點校，收入《宋元筆記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二、近人著論・專書

(一) 中文部分

1. 王謩，《宋平江城坊考》，揚州：廣陵書社，2003。
2.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臺北：允晨文化出版社，2003。
3. 余書麟，《中國教育史》，臺北：台灣省立師範大學出版組，1960-1961。
4. 李弘祺，《宋代官學教育與科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3。
5. 周恩文，《宋代的州縣學》，臺北：國立編譯館，1996。
6. 胡鳴盛，《安定先生年譜》，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
7. 苗春德，《宋代教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
8. 袁征，《宋代教育——中國古代教育的歷史性轉折》，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9. 袁征，《學校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0. 高柯立，《官民之間：南宋地方官府與民眾的溝通》，北京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6。
11. 張春生，《兩宋官學教育政策研究》，河北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12. 梅汝莉主編，《中國教育管理史》，北京：海潮出版社，1995。
13. 郭齊家、王炳照主編，《中國教育史研究·宋元分卷》，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14. 郭聲波，《宋朝官方文化機構研究》，成都：天地出版社，2000。
15. 陳東原，《中國科舉時代之教育》，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16. 陳東原，《中國教育史》，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17. 陳青之，《中國教育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上海：上海書店，1989重印。

1989 重印。

18. 陳雯怡，《由官學到書院——從制度與理念的互動看宋代教育的演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19. 陳榮照，《范仲淹研究》，香港：三聯書店，1987。
20. 喬衛平，《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三卷·宋遼金元》，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
21. 黃仁賢，《中國教育管理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22. 賈志揚 (Chaffee, John W.)，《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23. 劉伯驥，《宋代政教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
24. 蔡春編，《歷代教育筆記資料·第二冊·宋遼金元部分》，北京：中國勞動出版社，1991。
25. 錢穆，《國史大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
26. 顧宏義，《教育政策與宋代兩浙教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二) 外文部分

1. Hymes, Robert P.,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 Lee, Thomas H. C., *Education in Northern Sung China*, Ph. D. thesis, Yale University, 1974.
3. Mcknight, Brian, *Village and Bureaucracy in Southern Sung Chin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1.
4. Nesar, Ellen G., *The cult worthies : a study of shrines honoring local Confucian worthies in the Sung dynasty (960-1279)*, Ph. D.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93.
5. Theodore de Bary, Wm and Chaffee, John W. ed., *Neo-Confucian*

1989.

6. 伊原弘，《蘇州——水生都市の過去と現在》，東京：講談社，1993。
7. 寺田剛，《宋代教育史概說》，東京：博文社，1965。
8. 狩野良知，《支那教學史略》，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03。

三、近人著論・論文

（一）中文部分

1. 于志嘉，〈日本明清史學界對「士大夫與民眾」問題之研究〉，《新史學》第4卷第4期（1993.12），頁141-175。
2. 內藤虎次郎，〈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入《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pp.10-18。
3. 方誠峰，〈統會之地——縣學與宋末元初嘉定地方社會的秩序〉，《新史學》第16卷第3期（2005.09），頁1-22。
4. 包弼德（Pol, Peter K.），〈美國宋代研究的近況〉，《新史學》6卷3期（1993.09），頁185-205。
5. 包弼德著，吳松弟譯，〈地方史的興起——宋元婺州的歷史、地理和文化〉，《歷史研究》第21輯（2006），頁432-452。
6. 朱瑞熙，〈再談宋墓出土的太學生牒〉，《嚳城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107-120。
7. 朱瑞熙，〈范仲淹和慶曆新政研究〉，收入朱瑞熙、程郁著，《宋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頁102-115。
8. 吳雅婷，〈回顧一九八〇年以來宋代的基層社會研究——中文論著的討論——〉，《中國史學》第12卷（2002.10），頁65-93。
9. 李弘祺，〈宋代地方學校職事考〉，《史學評論》第8期（1984.07），頁

223-241。

10. 李弘祺，〈宋代的舉人〉，《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暨史學系，1988），頁 297-313。
11. 李弘祺，〈宋代教育史研究的幾個方向〉，收錄於《宋代教育散論》（臺北：東昇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頁 1-22。
12. 李弘祺，〈宋代教育與科學的幾個問題〉，收錄於《宋代教育散論》（臺北：東昇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頁 35-72。
13. 李弘祺，〈宋代教育與科學散論〉，收錄於《宋代教育散論》（臺北：東昇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頁 97-128。
14. 李弘祺，〈范仲淹與北宋書院的傳統〉，《范仲淹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399-1426。
15. 李弘祺，〈絳帳遺風——私人講學的傳統〉，收入《中國文化新論》第 2 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頁 343-410。
16. 李如鈞，〈從「給復學田公牘」碑刻看宋代的學田爭訟〉，未刊稿。
17. 汪永澤，〈蘇州的變遷和發展〉，《江蘇城市歷史地理》（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2），頁 74-90。
18. 周林根，〈宋代學校訓導及其重要學規〉，《訓育研究》7:2（1968.10），頁 17-22。
19. 周荔，〈宋代的學田〉，《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諸問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頁 153-174。
20. 岸本美緒，〈發展還是波動？——中國「近世」社會的宏觀形象〉，《近世中國的社會與文化（960-1800）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二）》（台北：台灣師範大學，2005），頁 1-16。
21. 林子勛，〈宋代地方教育的發展〉，《華岡學報》第 2 期（1965.12），頁 155-176。
22. 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81 期（2006.01），頁 125-171。

23. 張家瑋，〈宋代蘇州府學——地方教育的實踐與困境〉，未刊稿。
24. 梁庚堯，〈宋元時代的蘇州〉，《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1997），頁 334-480。
25. 梁庚堯，〈宋元時代蘇州農業的發展〉，《宋史研究集》17 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86），頁 491-523。
26. 梁庚堯，〈宋代太湖平原農業生產問題的再檢討〉，《台大文史哲學報》第 54 期（2005.05），頁 261-304。
27. 梁庚堯，〈宋代的義學〉，《臺大歷史學報》第 24 期（1999.12），頁 177-224。
28. 梁庚堯，〈宋代城居官戶與士人的經濟來源〉，《宋代社會經濟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1997），頁 219-321。
29. 梁庚堯，〈歷史未停滯：從中國社會史分期論爭看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臺大歷史學報》第 35 期（2005.6），頁 1-53。
30. 郭寶林，〈北宋的州縣學〉，《歷史研究》1988 年第 2 期（1988.04），頁 80-91。
31. 陳東原，〈宋代的科舉與教育〉，《學風》第 2 卷第 9 期（1932），頁 5-39。
32. 陳高華，〈元代地方官學〉，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 5 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160-189。
33. 陳國燦、高飛，〈宋代兩浙地區州縣學發展論述〉，《台州師專學報》第 21 卷第 1 期（1999.02），頁 17-21。
34. 陳雯怡，〈書評：The Thorny Gate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中國文化研究學報》新第 5 期（1996），頁 325-327。
35. 陳雯怡，〈書評：袁征著《宋代教育》、苗春德主編《宋代教育》〉，《新史學》4 卷 4 期（1993.12），頁 195-205。
36. 陳學霖，〈范仲淹與蘇州地區之發展〉，《范仲淹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90），頁 1083-1150。

37. 焦綠，〈略談宋墓出土的補中太學生牒〉，《文物》1977年第7期，頁33-34。
38. 程禹文，〈胡瑗及其蘇湖教學方法述論〉，《北京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1989），頁70-74。
39. 程禹文，〈胡瑗及其蘇湖教學法述論〉，《北京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2期，頁70-74。
40. 程運，〈兩宋學校制度之分析〉，《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24期（1971.12），頁85-109。
41. 黃書光，〈宋代地方官學考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4（1986），頁53-57。
42. 黃寬重，〈兩宋政策與士風的變化〉，發表於《基調與變奏：7-20世紀的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專題演講，2007.9.3。
43. 葛紹歐，〈宋代四川地區的州縣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2期（1984.06），頁23-83。
44. 葛紹歐，〈宋代州府的貢院〉，收入鄧廣銘、漆俠編，《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選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1992），頁304-319。
45. 葛紹歐，〈宋代的提舉學事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8期（1990.06），頁1-11。
46. 葛紹歐，〈宋代湖州的文教〉，《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5期（1987.06），頁95-118。
47. 葛紹歐，〈宋代徽州的教育〉，《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88），頁535-550。
48. 葛紹歐，〈范仲淹對宋代地方教育的貢獻〉，《范仲淹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90），頁1151-1184。
49. 董金裕，〈范仲淹與宋初的教育及學術〉，《范仲淹一千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90），頁1427-1444。
50. 漆俠，〈宋代地租型態及其演變——兼論地價及其與地租的關係〉，《求

- 實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頁 194-246。
51. 漆俠，〈宋代貨幣地租及其發展〉，《求實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頁 176-193。
52. 漆俠，〈宋代學田制中租佃關係的發展〉，《求實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頁 160-175。
53. 趙鐵寒，〈宋代的州學〉，《大陸雜誌》7 卷 10 期、11 期(1953)，頁 15-19、15-17。後載於《宋史研究集》第 2 輯，(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4)，頁 343-362。
54. 趙鐵寒，〈宋代的學校教育〉，《學術季刊》第 3 卷第 2 期(1954.12)，頁 36-47。
55. 劉子健，〈宋末所謂道統的成立〉，收錄於《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 249-282。
56. 劉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收入張永堂、段昌國、劉紉尼譯，中國思想研究委員會編，《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頁 123-161。
57. 劉子健，〈秦檜的親友〉，收錄於《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 143-171。
58. 劉子健，〈略論宋代地方官學與私學的消長〉，《宋史研究集》第 4 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69)，頁 189-207；原載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6 本(1965)。
59. 劉真，〈宋代的學規與鄉約〉，《宋史研究集》第 1 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58)，頁 367-391。
60. 蔣義斌，〈日記的自我管理功能與宋代社會變遷〉，發表於《海峽兩岸宗教文化與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
61. 鄭丞良，〈「作新士息之機」：試論宋元之際四明士人風氣與九先生祠的設置〉，(未刊稿)
62. 鄭丞良，〈「鄉先生祠於社」：試論宋代鄉賢祭祀的場域與論述〉，未刊

稿。

63. 鄧小南，〈北宋蘇州的士人家族交遊圈——以朱長文之交遊為核心的考察〉，《國學研究》3（袁行霈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02），頁 451-488。
64. 鄧小南，〈朱長文家世、事歷考〉，《北大史學》4（北京大學歷史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08），頁 72-87。
65. 鄧小南，〈龔明之與宋代蘇州的龔氏家族：兼談南宋崑山士人家族的交遊與沈浮〉，《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81-109。
66. 韓鳳山，〈北宋多渠道籌措官學經費述論〉，《社會科學戰線》2002 年第 2 期，頁 146-148。
67. 顧宏義、王守琴，〈兩宋州縣學官及其任用考核制度〉，《洛陽師範學報》2001 年第 4 期，頁 69-72、80。

（二） 外文部分

1. Chaffee, John, "Review: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in Sung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07, No. 3.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Jul-Sep, 1987), pp. 497-500.
2. Ebrey, Patricia, "Review: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in Sung China*,"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26, No. 4.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Summer, 1986), pp. 589-590.
3. Hartwell, Robert M.,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2, No. 2 (1982), pp. 365-442.
4. Lee, Thomas H. C., "Life in the Schools of Sung China", in *Journal of*

- Asian Study*, 37(1977), pp. 45-60.
5. Lee, Thomas H. C., "Sung Schools and Education before Chu Hsi", in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John W. Chaffee ed.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05-136.
 6. Lee, Thomas H. C.,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Quota System in Sung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13(1982), pp. 287-318.
 7. Zheng, Yuan, "Local Government Schools in Sung China: A Reassessment",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Vol. 34, No. 2.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Summer, 1994), pp. 193-213.
 8. 山口智哉，〈宋代先賢祠考〉，《東洋史論叢》第15號（2006.11），頁89-111。
 9. 山口智哉，〈宋代鄉飲酒禮考——儀礼空間としてみた人的結合の〈場〉〉，《史學研究》241期（2003）。
 10. 川上恭司，〈宋代の都市と教育——州縣學を中心に〉，收入梅原郁編《中國近世の都市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4），頁359-388。
 11. 王瑞來，〈宋代士大夫の精神世界の側面——范仲淹を中心に——〉，《東洋學報》82卷2期（2000），頁195-232。
 12. 加藤繁，〈蘇州今昔〉，《支那學雜草》（東京：生活社，1944）。
 13. 伊原弘，〈中國知識人基層社會——宋代温州永嘉學派を例として——〉，《思想》802期（1991）。
 14. 伊原弘，〈江南における都市形態の變遷——宋平江圖解讀作業〉，《宋代の社會と文化》（東京：汲古書院，1983），頁103-138。
 15. 伊原弘，〈宋代の浙西における都市士大夫〉，《東洋學》第45號（仙台：中國文史哲研究會，1982），頁44-62。

16. 伊原弘，〈宋代浙西における都市と士大夫〉，《中嶋敏先生古稀記念論集》上卷（東京：汲古書院，1980），頁 327-350。
17. 伊原弘，〈唐宋時代浙西における都市の變遷——宋平江圖解讀作業〉，《中央大學紀要・史學科》24（1979）。
18. 地濃勝利，〈宋代の蘇州水利田地域に於ける水利勞役に就いて——佃戸の勞役負擔の解明に向けて〉，《社會經濟史學》43-4（1977），頁 23-44。
19. 寺地遵，〈南宋期、浙東盜湖問題〉，《史學研究》183（廣島大學，1989），頁 17-31。
20. 足立啓二，〈宋代兩浙における水稻作の生産力水準〉，《文學部論叢・史學篇》17（熊本大學，1985），頁 80-100。
21. 周藤吉之，〈宋代浙西地方の圍田の發展〉，《宋代史研究》（東京：東洋文庫，1969），頁 305-436。
22. 周藤吉之，〈宋代浙西地方の圍田の發展補論〉，《東洋大學紀要》4（1968），頁 43-56。
23. 高橋芳郎，〈宋代の士人身份について〉，《史林》69 卷 3 期（1986），頁 39-70。
24. 斯波義信，〈南宋におけ「中間領域」社會の登場〉，佐竹靖彦編《宋元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6），頁 185-204。
25. 福澤與九郎，〈宋元時代州縣學產考〉，《福岡學藝大學紀要》第 8 期、第 9 期（1958、1959），頁 27-42、27-38。
26. 遠藤隆俊，〈宋代蘇州の范文正公祠について〉，《柳田節子先生古稀記念中國傳統社會と家族》（東京：汲古書院，1993），頁 329-346。
27. 遠藤隆俊，〈宋代蘇州の范氏義莊について〉，《宋代知識人——思想・制度・地域社會》（東京：汲古書院，1993），頁 195-228。
28. 礪波護，〈唐宋時代における蘇州〉，收入梅原郁編《中國近世の都市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4），頁 289-320。

29. 櫻井智美，〈儒學提舉司の起源と變遷——兼論宋金の學校管理〉，
《阪南論集（人文自然科學編）》37:4（2002），頁 41-52。
30. 塩卓悟，〈南宋代における蘇州の經濟的性格と商品流通構造〉，《千
里山文學論集》59（關西大學大學院，1998.03），頁 87-112。

